

# 國民黨苗栗縣 基層專職黨工關係網絡之研究

鍾道明\* 黃東益\*\*

## 摘要

台灣的地方選舉特色之一就是講求人情關係連帶。政黨或政治人物除了要履行他們的選舉政見和諾言之外，還必須重視選區經營和選民服務來建構他們的社會網絡與群眾基礎，使其關係網絡滲透到社會各階層角落，在選舉時轉換成動員力量或選票以贏得勝選。

國民黨自一九五二年起在全台各鄉鎮市設立了民眾服務站，且招募為數眾多專職黨工，透過民眾服務站的組織運作方式和基層黨工平時與地方民眾建立情感來發展它的關係網絡。但是現有學術研究中有關基層黨工的研究並不多見，致對公共事務的瞭解或解釋顯有不足之處。本文認為國民黨基層黨工在地方公共事務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角色，其經營基層之運作方式應是值得研究的素材。

本文藉由關係發展階段理論，針對國民黨苗栗縣各鄉鎮市民眾服務站的退休及現任基層黨工，以個別訪談、焦點座談以瞭解他們在地方社會中發展關係網絡的情形。研究發現國民黨基層黨工早期透過人情交往及關係取向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網絡和群眾基礎，確實是過去國民黨在基層社會普遍獲得民眾支持的主要因素。但是隨著台灣民主化、社會趨勢與政黨輪替的進程，基層專職黨工的社會關係網絡在面對選民投票影響力上已面臨資訊科技、意識型態等嚴峻挑戰，也使他們面臨被裁撤的命運。

**關鍵字：**國民黨、地方黨部、民眾服務站、專職黨工、關係網絡

---

\*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專任副教授。

## 壹、前言

義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在其《獄中札記》中討論「現代君王」時曾說：「如果現在要再寫一本新的《君王論》，那麼主角將不再是一位個別的英雄，而會是政黨。因為政黨在不同時期和相異民族的不同內部關係裏，它均致力於肇創一種新的國家型態。因此，政黨已然取代馬基雅維利 (Niccolo Machiavelli, 1459-1517) 眼中的君王，成為現代政治的新君王」。葛蘭西認為「政黨除了肩負著組織與動員群眾參與政治的一般功能外；在威權體制的國家裏，政黨還相當程度的滲入到社會體系的內部，成為國家機器 (state apparatus) 運轉的核心機制。從政黨延伸至政府，再進而擴伸到國家，整個社會都被緊密納入一套嚴謹的運作系統裏」，因此現代政黨的地位已足稱「新君王」。所以，當我們試圖探析當代政治的脈動時，焦距若不對準政黨已是不可能的事<sup>1</sup>。

政治學者夏特史奈德 (E. E. Schattschneider) 在其所著《政黨政府》 (Party Government) 一書之序言指出，「要了解一個政黨，完全得看研究者在分析時，是否能掌握真正的問題核心」<sup>2</sup>。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有著密切的關聯，它在台灣發展組織的歷史可溯自民國 29 年 (1940)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命翁俊明負責籌設台灣黨部開始，以及民國 35 年 (1946) 台灣光復後，台灣省黨部的進駐及在各縣市設立「黨務籌備員辦事處」籌備建立它的基層組織和吸收黨員。但是國民黨真正全面積極的發展它地方黨務工作卻是在民國 38 年 (1949) 中央政府撤退來台之後，隨著國民黨政權移入台灣，國民黨以黨組織的重建 (party-building) 開始對台灣社會進行全面性滲透，透過其黨的組織運作機制，使得國民黨在基層社會中擁有甚強的控制能力 (control capacity) 與回應能力 (response capacity)，並得以穿透它掌握台灣社會、控制地方達五十年之久<sup>3</sup>。

### 一、二重侍從主義機制論述

對於國民黨在台灣社會進行全面性支配的觀察，部份學者接受吳乃德的觀點，認為國民黨政府在國政層級上有所謂的「外省人」 (Mainlanders) 壟斷的「統治菁英」結構 (national ruling elite) 和「台灣本省人」 (Taiwanese) 組成的「地

<sup>1</sup> 蔡詩萍，《誰怕政治》 (台北：桂冠，1989 年)，頁 217-218。

<sup>2</sup> 楊泰順，《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 (台北：民主基金會，1991 年)，頁 125。

<sup>3</sup> 陳三井，《中國國民黨與台灣》 (台北：中央文物，1985 年)，頁 120-124。謝鴻儀主編，《一甲子年史—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民國 29 年至民國 89 年》 (台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印行，2000 年)，頁 180-183。陳曉慧，〈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中對社會基礎的強化〉，《藝術學報》，63 期 (1998 年)，頁 209。林佳龍，〈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市場化—從威權鞏固到民主轉型〉，《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 (台北：月旦，1998 年)，頁 245。

方公職政治菁英」結構（local elite）的「政治菁英族群二重結構」。以及國民黨以此「族群二重結構」為前提，在地方社會中操作「政黨侍從主義機制」和「選舉侍從主義機制」的「二重侍從主義機制」來掌握其權勢（power-holders）和它在台灣的正統性（legitimacy）。吳乃德認為國民黨運作「二重侍從主義」時有兩個系統，一是在鄉鎮層次設立區黨支部和其一體化的民眾服務社的黨組織（party clientilism）；另一則是與擁有選舉網絡的地方政客交換利益的之侍從主義機制（electoral clientilism）。朱雲漢和陳明通進而對台灣選舉侍從主義之核心勢力即「地方派系」做理論與實證研究，提出「統治菁英、地方派系、地方選民」三者間侍從主義機制之論述<sup>4</sup>。

在此略予說明「選舉侍從主義機制」的意義，它指的是「國民黨」和「地方派系」之間以及「地方派系」和「選民」之間，兩兩互為「雇主」（patron）與「侍從者」（client）的一種「上下利益交換」的關係。「雇主」提供「侍從者」物質性的利益如金錢、就業、官商合約、特權貸款、特許行業、優惠措施等和非物質性的利益如安全保護、社會聲望等。而侍從者則回報以政治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即是選票，其目的在為雇主創造更大的權勢用以均霑更多的利益。國民黨統治者就是透過這種有意設計之「侍從主義」或稱「恩庇主義」，以公共資源按多層「侍主-隨從」結構來進行分配，利用地方派系幫助國民黨政權來穿透其本身難以穿透的本地社會，而國民黨則回報地方派系以區域性的寡占經濟特權<sup>5</sup>。以此觀點，地方派系現象成為台灣政治學者的研究焦點。

而在「政黨侍從主義機制」的論述中，對於國民黨組織的研究可由陳曉慧所指，國民黨在全省各地普遍設立「民眾服務站」，藉著為民服務的方式與過程來和民眾接觸、互動並建構它與社會各群體間的關係以建立其社會基礎，對社會做全面性的滲透與控制<sup>6</sup>。而龔宜君則以「滲透」的觀點，分析國民黨是在特殊的結構條件下，透過其改造後在全台各縣市普遍建立之黨組織的滲透機制和被滲透的不同社會和族群基礎之間建立關係來維繫其政權<sup>7</sup>。由於國民黨透過這種隱而不露的服務和滲透機制，使得國民黨在台灣恰如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言「老大哥無所不在，但你卻毫無所覺」<sup>8</sup>。

<sup>4</sup> 若林正丈（Masatake Wakabayashi），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新自然主義，1994年），頁37-42。

<sup>5</sup> 林佳龍，同註3，頁193-194。吳重禮，〈亦敵亦友：論地方派系與國民黨候選人選擇過程的互動模式〉，《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學報》，7期（1998年），頁179。

<sup>6</sup> 陳曉慧，同註3，頁211。

<sup>7</sup>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台北：稻鄉，1998年），頁27-29、頁133-134。

<sup>8</sup>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合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澄社，1991年），頁22。

## 二、對派系侍從機制論述的質疑

政治學是一個相當多樣化的研究領域，學者之間或因所持意識型態立場、基本假設或價值偏好或所採取的研究途徑不同，對於同一個研究對象所產生的研究結果或闡釋也因之存有相左的看法<sup>9</sup>。政治學者 John Morrow 指出，政治思想始終具有一股濃烈的「預設傾向」。也就是說，政治學者試圖深入理解政治的性質以及各項特定政治問題時，難免都會提出其所持特定政治理念之論證<sup>10</sup>。

以選舉侍從主義的地方派系現象來說，作者在基層二十多年的服務經驗與所認知的事實並非如部分學者論述的恩庇與利益交換，認為他們的研究可能僅是個案現象，並沒有全面的視野。我們以趙永茂對「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結構」的研究數據觀察，他把台灣社會的地方派系分為（1）嚴重派系對立、（2）輕微派系對立、（3）無派系等三個層次。他所謂的「嚴重派系對立」是指非但選舉過程中派系嚴重的衝突、對立杯葛，在當選之後雙方或多方亦激烈對立，發生衝突事件，而致影響公務或公益。而「輕微派系對立」則指只在選舉過程中兩方或兩方以上派系，彼此發生對立、衝突事件，選舉過後即無嚴重衝突對抗事情。而「無派系」是指在選舉過程中或選舉後在公所或代表會間無派系對立、衝突的具體事件發生。趙永茂指出包括台北、高雄兩院轄市在內的台灣地區 23 個縣市中，地方政治或選舉受到地方派系影響的縣市有 17 個，佔 74%。在台灣 309 鄉鎮縣轄市中，依據前述標準統計，派系嚴重的鄉鎮市有 45 個，佔 14.6%；輕微派系對立的有 109 個，佔 35.3%；合計有 154 個，佔 49.9%；無派系的鄉鎮市有 155 個，佔 50.1%<sup>11</sup>。

其次，我們也可從廖忠俊與陳怡如在有關台北縣的派系個案研究中找到反證，他們分別表示「台北縣並沒有全縣性的地方派系，在 29 個鄉鎮市中只有三重、板橋、永和、中和、新莊、淡水等部份鄉鎮市長期存在有對立的派系勢力」<sup>12</sup>。王金壽的個案研究也指出，屏東縣的 33 個鄉鎮市中，除了 8 個原住民鄉外，其餘的 25 個鄉鎮市中，13 個鄉鎮存有地方派系，另 12 個鄉鎮則沒有地方派系<sup>13</sup>。綜上略舉相關研究數據來看，地方派系並非全面普遍的存在於台灣地方社會。由

<sup>9</sup> 周育仁、鄭又平，《政治經濟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2 年），頁 28。

<sup>10</sup> John Morrow，李培元譯，《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台北：韋伯文化，2004 年），頁 4。

<sup>11</sup> 趙永茂，《台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台北：翰蘆圖書，1997 年），頁 209。趙永茂，〈基層政治菁英之個人背景分析〉，《思與言》，第 25 卷、第 6 期（1988 年 3 月），頁 572。

<sup>12</sup> 廖忠俊，《台灣地方派系及其主要領導人物》（台北：允晨，2000 年），頁 50。陳怡如，〈政黨競爭與地方派系轉型之研究—台北縣中和市的個案分析〉（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2003 年），頁 2。

<sup>13</sup> 王金壽，〈國民黨候選人買票機器的建立與運作：一九九三年風芒縣長選舉的個案研究〉，《台灣政治學刊》，2 期（1997 年），頁 8。

前提條件的不足，我們就可以瞭解到某些學者所指國民黨以「恩庇-侍從」關係利用地方派系來取得或掌控政權的論述證據顯然是不充分的。

再者，即便某些地方曾經出現過派系對立現象，也會隨著政壇風雲流轉，或政治現實取代鄉土人情牽繫，許多地區早期所形成的地方派系已然消逝。例如桃園、新竹兩縣改以宗親為主流，彰化縣山頭取代了派系，花蓮縣選舉時候選人強調的是族群意識，高雄市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族的各領風騷，而基隆市久已不聞派系聲音，有的只是個人利害的結合……等等，可見派系人物或現象並非恆久<sup>14</sup>。

無可諱言的，地方派系的現象是地方自治與公共事務問題當中的一環，但它並非全部。地方派系在平時是隱而不顯，在選舉時才突顯了它的社會異質性。事實上，部分媒體或學者所聲稱的「地方派系人物」，未嘗不是媒體在他們登記參選公職的時刻起，或是在地方事務的互動中，以「人情」、「關係」的異同予以「標籤化」成「非此即彼」的派系人物，讓他們積非成是的成為「事實」。因此我們可從「一些已被外界認為是從事派系活動，賦予派系名稱的政治人物，自己則可能會極力否認自己是派系人物」<sup>15</sup>。王金壽在其研究中亦明白表示，「對於派系人物的認知，是以一般新聞媒體報導為認定的標準，當事者或是一些受訪者並不承認這樣的分類」得到相當的佐證<sup>16</sup>。同時，派系以及派系人物的角色與地位在地方公共事務所呈現的「個案」問題，也是部份研究學者用放大鏡把它給局部放大了，若再加上意識型態或者道德的光環，把部份或個案的事實推衍成全面的可能，做了「以偏蓋全」的結論。

高承恕認為「社會問題的面向是複雜多樣的，學術上的研究，基本上只是建構了基本理論與發掘出事實的基本輪廓，幫助我們對該現象的了解，但卻永不等於事實的真相。」以及「雖然不是任何一位學術研究者所樂見，但是學術殿堂的著作，往往是束之高閣，學者之外難以窺望」<sup>17</sup>。因此，一些被作為研究的「地方派系」對象沒有機會予以指正謬誤，這樣的學術研究成果，若再任由研究學生以「次級資料」作為他們的研究論述依據時，他們若忽略了對於事實真相或脈絡的探討理解就逕予移植、轉載、引述，彼此相呼應的結果，很可能「積非成是」的對基層公共事務造成誤解。

<sup>14</sup>張昆山、黃政雄，《地方派系與台灣政治》（台北：聯經，1996年），頁6。

<sup>15</sup>蔡明惠，《台灣鄉鎮派系與政治變遷—河口鎮「山頂」與「街仔」的爭鬥》（台北：洪葉文化，1998年），頁1。

<sup>16</sup>王金壽，同註13，頁10。

<sup>17</sup>高承恕著，劉仁傑主編，《頭家娘：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台北：聯經，1999年），頁20。

### 三、基層黨工是國民黨長期執政的基礎之一

如果國民黨在基層不全然是依賴地方派系，那麼國民黨做為一個政黨，它是如何建立其社會基礎？又是如何運作來獲得民眾的信賴和支持？對於這樣的質疑，我們或可由王振寰所指「國民黨的組織特色，就是每一層級政府就有相對層級的黨組織來監控其運作」。國民黨透過其正式的編制與常態的黨組織系統、制度性的運作，他們靠著為數眾多的專職黨工及義務幹部平時的經營和服務，構成了層層的社會網絡，在選舉時就轉換成選票動員的基礎得以了解<sup>18</sup>。

顯然的，國民黨過去在地方基層組織的發展是採取兩種方式同時進行的，一是透過國民黨本身的組織的發展，黨員的吸收以及全面的操控地方，讓基層勢力陸續納入其政黨體系的掌握，來進行其全方位的滲透，達成其全面的控制。第二種方式是對於地方領導菁英的網羅，國民黨除了透過其黨內提名參選的機制之外，更對於全省各地方非國民黨籍的選任菁英進行吸收入黨。這樣雙管齊下，不但可藉由選舉動員來整編地方政治勢力，用來強化國民黨在基層民意機關的力量，也順勢拉攏了地方菁英和原有的地方勢力，以利其遂行社會控制的動員<sup>19</sup>。

陳曉慧與龔宜君分別指出，民眾服務站的設置成為國民黨組織滲透台灣基層社會的掩體。基層的「區黨部」與「民眾服務站」有一暗一明之分，「區黨部」對內是國民黨鄉鎮區級領導中心，負責開展組織工作，對外則是以「民眾服務站」以服務方式來和廣大群眾接觸<sup>20</sup>。換言之，國民黨在平時是透過「民眾服務站」以「服務」成果積累的過程來建立它與民眾的情感，而在選舉時則將它轉換成「區黨部」輔選動員的基礎。所以，國民黨以「民眾服務站」做為它的區黨部組織化身之後，在基層社會能夠持續贏得選舉，並透過選舉過程進行「準列寧式政黨」（quasi-Leninist party）的組織調整，成為極少數成功駕馭民主化浪潮的威權政黨<sup>21</sup>。

前揭論述雖然解釋了當年國民黨透過其地方黨部組織系統與動員方式對於台灣社會的高滲透能力，但是地方黨部如何動員？執行方式如何？這些屬於「人」的因素，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則鮮少討論，導致許多人對地方公共事務的瞭解與認知產生落差。其理由可能是早期國民黨的地方黨部對內是「區黨部」的秘密的組織，對外卻以「民眾服務站」為名，長期保密結果，致有民眾將將「民眾服務站」誤認是政府的派出機關所在多有<sup>22</sup>。

<sup>18</sup> 王振寰，《誰統治？如何分析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1996年），頁58、218。

<sup>19</sup> 蔡明惠，同註15，頁65。

<sup>20</sup> 陳曉慧，同註3，頁209-212。龔宜君，同註7，頁192-193。

<sup>21</sup> 林佳龍，同註3，頁245。

<sup>22</sup> 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1992年），頁136。

試想一個擁有二、三千個黨工的龐大組織，若是專職黨工飽食終日然後靠地方派系的恩庇就可掌握政權，那黨工存在超過五十年的必要性與價值為何？其理自明。因此，作者認為研究台灣的地方政治生態或公共事務，若能針對久為人所忽視的國民黨民眾服務站組織機制和其所屬基層黨工在地方社會中之關係網絡進行研究，將有助於補充或釐清現有地方自治與選舉的觀察與解釋。因此，本文對於國民黨民眾服務站專職黨工的研究可說是一種嘗試，冀喚起社會予以關心並探究此議題，讓活潑客觀的研究精神得以注入。

## 貳、文獻探討

### 一、政黨內部權力落在黨工身上

學者蘭尼與肯道爾（Austin Ranney and Willmoore Kendall）認為「政黨」（political party）是「一群具有共同目標、理念或利益而結合而成的組織化團體。它透過競選活動以爭取執政和人事控制權」<sup>23</sup>。「政黨」在憲政體制下，政黨的功能係透過選舉競爭的運作以爭取政治職位與掌握政府的權力。而在政黨獨占政治權力的政體中，更常被形容是政治壟斷和控制的機制<sup>24</sup>。所以，政黨在組織結構上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政治體系。更重要的，它還是個決策體系<sup>25</sup>。因此，有相當多政治學者研究政黨會聚焦於政黨內部的權力落在何方？

最早研究政黨內部民主運作的學者奧斯特葛斯基（Mosei Ostrogorski）在其《民主與政黨組織》（*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一書指出，政黨機器之影響力日益增強，政黨內的控制權已由資深的黨團幹部所掌握。密歇爾斯（Robert Michels）在其《政黨》（*Political Parties*）一書中分析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權力結構時發現，雖然該政黨在形式上是民主的，但權力卻集中在少數政黨領袖的手中，他認為「一切組織都是寡頭的」，因此他提出了「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論點。馬坎茲（Robert McKenzie）在《英國政黨》（*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分析比較英國菁英領袖導向的「保守黨」和高度內部民主的「工黨」兩黨的權力分配時指出，兩大黨的權力皆由國會領袖的網絡所支配，密歇爾斯的寡頭統治學說再度受到重視。再以美國的政黨來說，美國

<sup>23</sup> Andrew Heywood, 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重譯,《最新政治學新論》(台北: 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 2002年), 頁386、395。

<sup>24</sup> 吳文程,《政黨與選舉概論》(台北: 五南, 1996年), 頁8。

<sup>25</sup> 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 雷飛龍譯,《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台北: 韋伯文化, 2000年), 頁87。

政黨基礎在於「政黨機器」(machine politics)的「黨霸」(party boss)身上，他們是權力的捐客，在政黨提名大會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sup>26</sup>。

本世紀德國最偉大之社會、政治思想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 1929-)指出，「政黨是政治意識形成的工具；但是，他們並不掌握在公眾手中，而是掌握在操縱著政黨機器的人手中」<sup>27</sup>。列寧(V.I. Lenin)在其所著《該做什麼？》(What Is to Be Done)一書中也解釋了共產黨必須依賴少數願意獻身、犧牲及有紀律的黨工幹部，而不能依賴具有共同利害的廣大無產階級的理由<sup>28</sup>。所以，他們直言政黨的黨工是政黨實現其社會控制、發揮組織力量與維繫政權最關鍵的因素所在。

## 二、民眾服務站仿效美國城市政黨組織

國民黨政府 1949 年退居台灣，由於置身歷史情境的必然性格，國民黨一直是，同時也被認為是「革命政黨」(revolutionary party)。因此，它在黨的體制架構上所展現出來的特性，就會呈現出具有列寧主義色彩的革命政黨架構<sup>29</sup>。但是民國 36 年(1947)「二二八事件」之後所引發的省籍、族群對立，使國民黨政權在語言、文化上與台灣民眾有所隔閡<sup>30</sup>。國民黨不得不省思如何經營其地方基層社會、掌握社會各階層領袖，因此，國民黨參考了美國城市「政黨機器」(party machine)組織型態和它稱做「政黨頭目」(boss)的黨工運作模式做為它經營基層社會的模式。

美國城市政黨組織稱作「政黨機器」(party machine)而它的組織領導者稱為「政黨頭目」(boss)，此機制溯自於 1789 年紐約市的「聖坦慕尼會社」(Society of St. Tammany Hall)。該會社原是以社會救濟、職業介紹、就業服務等以服務社會為宗旨的社團組織。自 1850 年代起由於該會社影響力深遠，被民主黨紐約市利用及轉型成為該政黨提名、人事分贓、控制選舉的政黨組織。黃文齡指出就該政黨機器的組織結構而言，它是一個「因地制宜」的地方政黨組織。其內部組織結構呈現多樣性且呈金字塔型排列，最上層的領導階級稱為「政黨頭目」(boss)，之下有「次層頭目」(sub-leaders)、「地區頭目」(district-leaders)、「選區頭目」(ward-leaders)、「區隊長」(precinct-captains)等各司其責。其

<sup>26</sup> Andrew Heywood, 楊日青等譯, 同註 23, 頁 400-401。

<sup>27</sup>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 曹衛東、王曉珪、劉北城、宋偉杰譯,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2<sup>nd</sup>.ed.) (台北: 聯經, 2002 年), 頁 264。

<sup>28</sup> Mancur Olson, 董安琪譯, 《集體行動的邏輯》(台北: 遠流, 1991 年), 頁 112。

<sup>29</sup> 蔡詩萍, 同註 1, 頁 239-240。

<sup>30</sup> 何來美, 《劉黃演義—苗栗近代政治史話》(台北: 台灣書店, 1997 年), 頁 11-16。陳曉慧, 同註 3, 頁 210。



內部組織體系是一個權責分明、正常運作的工作網絡，每個成員都必須嚴守紀律、絕對服從<sup>31</sup>。

黃文齡的研究認為早期美國「政黨頭目」(party boss)的社會關係是建立在人民的「社會需求」和資本家的「政治需求」之上。所謂社會需求是人民希望能透過政黨頭目來獲得各種日常生活必需的援助；而所謂政治需求則是人民或資本家希望透過政黨頭目的運作以獲得特權或特殊利益。政黨頭目和政黨機器不僅能適時伸出援手，也能做為他們聯絡的管道。只要民眾有問題，找到政黨頭目必定能夠獲得解決或者得到適當的指引，所以，政黨頭目與基層人民之間自然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基礎<sup>32</sup>。

而在生活層面上，政黨頭目與當地人民的關係更密切。政黨頭目非常重視酒館(saloon)的功能，拉攏酒館主人、在裡頭與人民喝酒聊天、噓寒問暖及聯誼互動等和人民的關係運轉至顛峰。而政黨頭目的「了解選民」和「信守承諾」及「平易近人」等特質也吸引了人民的支持。他們工作非常努力，人民隨時隨地都可找到他們，問題也立刻可以獲得解決，這種「馬上辦」的精神絕非按時上下班的官僚所能做到。政黨頭目融入基層人民的生活中，並適時伸出友誼之手，基層民眾身分低微，若有人伸出援手或信守對其所做之承諾，他們必會以感恩的心情對待這份受人重視的禮遇，這種心情很容易轉變成對政黨的效忠與回饋選票。另一方面，對資本家而言，政黨頭目和政黨機器是其與政府溝通或獲得特殊利益的便捷管道。私人企業需要政府的特許權狀和執照以拓展事業若遇有障礙時，政黨頭目可適時搭起政府和商人溝通的橋樑，因此資本家與政黨機器的關係也因此形影不離<sup>33</sup>。由於政黨頭目掌控地方黨部的政治機器，以物質利益動員選民、拔擢候選人並扶植其當選、任免人事等，因此他們成為正式政府架構之外的實際掌握統治權力者<sup>34</sup>。

國民黨基層黨工在融入基層人民的生活工作本質、內容和廣度上與美國城市政黨機器之政黨頭目(party boss)上確有相似性。劉義周的參與觀察研究發現，國民黨民眾服務社黨工與社區民眾的日常接觸頻繁，他們與鄉鎮市區內地方領袖甚為熟識。他常見這些黨工在政見發表會中、晚宴中、會議裡，與地方居民討論地區內一般事務，例如路燈之設置、公共工程補償等。他指出積極的區黨部書記尤其是關鍵人物，他們有過人的酒量，認識大部分地方領袖。這種平日建立起來

<sup>31</sup> 黃文齡，〈美國進步時期城市政黨組織與下層人民之互動關係之研究〉，《歐美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1年)，21卷、3期，頁54-55。

<sup>32</sup> 黃文齡，同註31，頁58-59。

<sup>33</sup> 黃文齡，同註31，頁61-63。

<sup>34</sup> 吳重禮，同註5，頁189。

的友誼，使他們有效的掌握地方的人際關係網；到了選舉時，以此人際關係為中心的輔選組自然就織順勢成形<sup>35</sup>。

此外，劉義周認為黨工是國民黨候選人贏得選舉的關鍵人物。他指出，國民黨民眾服務社所維持的人際關係網絡，對初次競選的候選人而言尤其是最重要的憑藉。因為大部分的選民與候選人很難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候選人常需透過國民黨區黨部與地方領袖做「直接的」溝通，然後再透過地方領袖「間接的」與選民搭起溝通橋樑。國民黨區黨部對地方領袖所做工作的成敗，就決定了直、間接溝通的效果，地方黨部工作成效愈佳，助選的功能愈顯著<sup>36</sup>。

國民黨退職黨工詹碧霞描述她的黨工生涯時指出，「專職黨工的信念就是靠服務來爭取民眾的選票，鞏固國民黨的政權。黨的機器雖然是一體成型，由中央發號司令，但如何在基層爭取選票，票票落櫃，那就是國民黨區黨部書記，在當地人稱民眾服務社主任的本事了」<sup>37</sup>。黨工蔡育全也表示，黨工雖然不是，也不同於地方政府機關公職人員。但是他們在地方公共事務中卻扮演多元化的角色，因此他認為「黨工是社會工作者，也是社會運動者和社會的潤滑者」<sup>38</sup>。

因此，本文針對地方公共事務中既讓人感到熟悉，卻又蒙上一層神秘面紗的國民黨「基層黨工」此議題做研究，可說是一種新的嘗試。同時基於展現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關懷，作者認為對於國民黨黨工在地方社會中的生活歷程與意義得以發掘瞭解，或可補充「台灣經驗」的內涵，當是本文的貢獻。

## 參、關係發展理論

在確定本文研究對象之後，國民黨民眾服務站的基層黨工是如何深入基層、走入群眾來建構其社會基礎呢？作者認為王振寰的論述頗為貼切。他說「關係取向的社會網絡連帶和文化滋養了台灣的政治。地方派系與政治人物只要做好關係即可，而不必要有政見和想法，更不必擔心政策的公共討論和議論」。因此，他認為「台灣式的民主特色就是人情關係重於對政見和政策的關注」，台灣的地方派系與政治人物都要靠著平時的選民服務，例如法律服務、參與婚喪喜慶、政治關說等來構成他們層層的社會網絡<sup>39</sup>。

這種人情交往、關係取向以及透過人情及關係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網絡關係，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人脈關係」，應是國民黨黨工運作之主要力量。國民黨除了

<sup>35</sup> 劉義周，〈國民黨責任區輔選活動之參與觀察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92年），第60期，頁216。

<sup>36</sup> 劉義周，同註35，頁228。

<sup>37</sup> 詹碧霞，《買票懺悔錄》（台北：商業週刊，1999年），頁211。

<sup>38</sup> 蔡育全，〈「黨工」是三百六十行之外的一行〉，謝鴻儀主編，同註3，頁89。

<sup>39</sup> 王振寰，〈台灣式的民主：一些觀察〉，蕭新煌主編，《考驗台灣命運》（台北：允晨，1995年），頁295。

透過它的民眾服務站使其權力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角落之外，也經由為數眾多的基層黨工與地方民眾建立關係網絡，藉著人情交往與感情建立，來維繫其社會基礎。

## 一、關係網絡理論的解釋與應用

### (一) 關係的意義與性質

#### 1、「關係」(relationship)的定義

政治學者家博(J. Bruce Jacobs)認為「關係」是人與人之間因認識或認同的「連帶」(ties)，它涉及兩造間的「相同」或「感情」<sup>40</sup>。「關係」無所不在，它影響著每一個人、每一樣行為，它可簡單的解讀是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絡。在商業行為及社交活動中，它可保障或獲取資源與利益，因此關係被視為「有價值的資產」<sup>41</sup>。我們可說「關係」基本上是一種長時期、多面向、雙向的溝通行為，當許多個體彼此間因為直接或間接的人情關係而得以相互連結成一個網絡時，我們稱這樣的網絡為「人情關係網絡」<sup>42</sup>。

個人或企業考量人情的因素時，基本上是傳統的以「自己」為中心的「差序格局」往外推展，「人情關係」的運用會是理性的選擇以主導經濟交換。其次，除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網絡關係之外，個人參與組織活動時還會考慮到該「組織」的價值觀。我們在研究產業網絡中確實發現到人際關係網絡會隨著「情勢」改變而改變，同時也會隨「組織」所存在的價值而運作，因為組織的價值能夠實現個人的交換效率、資源累積與正當性三種利益。因此，個人的人際關係網絡會考量前述三種利益而做出經濟理性的決定<sup>43</sup>。

#### 2、社會網絡即社會關係

黃毅志與張苙雲、譚康榮以及羅家德等學者指出在網絡分析圖上，關係網絡的建立剛開始是由個人的「節點」(node)與他所「認識」的其他「節點」之間串聯起來的「關係」或「線」(arc 或 line)所組成。有了這些「線」才有關係網絡的「面」，結合許多的線與面再形成網絡結構即「社會網絡」(social

<sup>40</sup> 廖忠俊，《台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台北：允晨，1997年)，頁35。

<sup>41</sup> 葉正綱，《中國消費市場行銷策略》(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2002年)，頁103。

<sup>42</sup> 王輝煌、黃懷德，〈經濟安全、家族、派系與國家：由制度論看地方派系的政治經濟基礎〉，徐永明、黃紀主編，《政治分析的層次》(台北：韋伯文化，2001年)，頁119-121。

<sup>43</sup> 張苙雲、譚康榮，〈形構產業網絡〉，《網絡台灣：企業的人情關係與經濟理性》(台北：遠流，1999年)，頁49-50、頁271-277。

network)。換言之，「社會網絡」指的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社會關係」。一般來說，社會階層越高者他就有越大的社會網絡，參與組織活動的也越多<sup>44</sup>。

至於「社會關係」的定義，張維安、陳介玄指出，「社會」是指人與人互動綿延的一組秩序或規律所形成的結構體，可以說是某種「生活結構」，它意味著人在生活中所經歷的一些不斷重複瑣事而成的常數。而「關係」則意指在前述的結構體當中所建立的特別感情和維繫情誼網絡，人們依此從事人際互動和活動。而人際關係所建立的基礎是行動者兩兩之間因為認識和往來所形成的社會關係網，對個別的行動者有社會控制的作用，這種作用社會學者稱之為「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所謂「鑲嵌」(embeddedness)就是指社會關係網絡，鑲嵌的出現是源自以血緣為基礎的初級人際關係網的「初級連帶」以及傳統的同學、同事、同鄉、同好、同業等「五同關係」所搭建起來的社會關係網，簡言之，社會鑲嵌的代名詞就是「人脈」<sup>45</sup>。

### 3、國外關係網絡之相關研究

「關係網絡」(networks)成為社會科學研究探索的對象始自 1970 年代，美國心理學家拉普波特及荷瓦士 (Anatol Rapoport and W. Horvath)、米爾格蘭 (Stanley Milgram) 及管諾維特 (Mark Granovetter) 等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找到模式來解釋。

美國心理學家拉普波特及荷瓦士 (Anatol Rapoport and W. Horvath) 於 1961 年以密西根州一所中學的一千位學生做實驗，來測試人際關係在訊息擴散上的效果。他們從研究對象的「人際關係網絡圖」中，顯示「好朋友」使人際網絡圈圈變小，「泛泛之交」使人際網絡的圈圈變大。因此，某個謠言若只在好朋友之間傳播，只會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裡傳來傳去影響不大。反之，若謠言經由「泛泛之交」傳播就會傳得寬廣。所以，「泛泛之交」多的人可以在建立情報網、經營知識創新、就業徵才、口碑行銷、建立客戶關係、尋找商業夥伴上占優勢<sup>46</sup>。

美國心理學家米爾格蘭 (Stanley Milgram, 1933-1984) 於 1967 年在美國中部的內布拉斯加州及堪薩斯州以隨機抽樣選出一批實驗者，寄信給他們請他們把信轉寄給設定在美國東北部的波士頓但卻沒有書明地址的實驗對象。受測試者接到此封請託函後也將信件寄給他們認為「有可能」幫助他完成此任務的友人，如法炮製的結果，出人意料的這些信被轉寄不到六次就寄達收信人處。也就是說轉寄的

<sup>44</sup> 黃毅志，《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台北：巨流，1999年)，頁 111-113。張苙雲、譚康榮，同註 43，頁 22。羅家德，《企業關係管理》(台北：聯經，2003年)，頁 76-82。

<sup>45</sup> 張維安、陳介玄，〈把生活結構放進來—三個台灣企業研究個案的分析〉，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編，《地方社會》(台北：聯經，1997年)，頁 188。

<sup>46</sup> Mark Buchanan 著、胡守仁譯，《連結—混沌複雜之後，最具開創性的「小世界」理論》(NEXUS: Small worlds and the Groundbreaking science of Networks) (台北：天下文化，2003年)，頁 67-69。

中介者不超過六人，因此他提出了「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概念<sup>47</sup>。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管諾維特 (Mark Granovetter) 在 1973 年發表了「弱連帶優勢」(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理論。他把家人或好朋友、同事之間的情誼稱為「強連帶」(strong ties)，而點頭之交之間的連結稱為「弱連帶」(weak ties)。管諾維特指出「強連帶」指的是一種經常互動，具有高度情感涉入，甚至多重連帶的關係，舉例來說，某個人和他妹夫一起工作，兩人也是好朋友。他們之間就包含了三種連帶：工作連帶、親屬連帶和朋友連帶。「弱連帶」也在我們社會中隨處可見，它指的是一種低度情感涉入的「點頭之交」。但是，弱連帶它可以發揮橋樑作用，讓人際關係網絡得以開展，並有助於資訊的流通和獲得，它扮演著維繫整個人際網絡的關鍵角色，因此，他認為弱連帶要比強連帶來的重要<sup>48</sup>。

管諾維特雖然提出了「弱連帶優勢」概念，認為弱連帶提供了人們取得自身所屬的社會團體之外的訊息與資源的管道。但是，他也指出「強連帶」可以傳遞影響力和信任、情感支持，對人際互動有較大的助益，尤其對處在「不安全位置」(insecure position) 的個人更有幫助。所以也不能忽視強連帶的重要<sup>49</sup>。但是，強連帶之所以強，就是因為互動較多，必須投入較多的資源和時間來加以維繫，除對社交時間會產生排擠效果外，也將使一個人的關係網絡變小，所以一群好朋友之間自然會成爲一個小圈圈<sup>50</sup>。

至於要如何判斷什麼樣的關係是強連帶或弱連帶？管諾維特認為可藉由連帶的「強度」，包括認識時間的長短，情感的緊密程度，可以相互傾訴的親密性以及互惠的服務內容來予以判定<sup>51</sup>。前揭社會心理學者對於人際關係網絡的實證探索成果，帶給社會學研究新的視野，發現關係網絡有了客觀之規律，得以將科學方法浸潤入社會學的新途徑。

#### 4、國內人情關係與關係網絡的研究

國內有關人情關係與關係網絡的研究大都被採用於社會心理學方面。社會學者張荳雲、譚康榮與張維安、陳介玄以及高承恕等以關係網絡理論來研究台灣中小企業中，企業主所呈現的社會關係網絡頗有建樹。張荳雲、譚康榮的研究指出，台灣中小企業的創業與供需產銷是循著中國文化特色之企業主個人的「強連帶」和「弱連帶」向外伸張網絡而進行。台灣經濟個體的成功和發長奠基於台灣社會

<sup>47</sup> 胡守仁譯，同註 46，頁 18-20。

<sup>48</sup> 胡守仁譯，同註 46，頁 65。

<sup>49</sup> 羅家德，同註 44，頁 55。

<sup>50</sup> 胡守仁譯，同註 46，頁 61。

<sup>51</sup> 羅家德，同註 44，頁 57-58。

特有的社會關係網絡，而這些關係網絡包含著能提供訊息與資源管道優勢的「弱連帶」以及對企業主有較大助益之「強連帶」<sup>52</sup>。

至於運用關係網絡理論於政治學領域上的研究則較少見，陳介玄曾用來解析地方派系的現象，他指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人情與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網絡與人際互動場域。同時關係網絡也解釋了派系本身就是人情與關係的再製者，派系借用了「人情」與「關係」的結構發展，使它得以透過選舉成熟化到具有政治支配力的基礎。因此，政治學者白魯侑 Lucian W. Pye 也認為「人際關係網」與「人際關係網」結合起來就構成了派系的基礎<sup>53</sup>。

## 二、關係發展階段之研究

國內現有學術領域中有關關係網絡的發展理論建構或研究大都傾向於企業界現象。社會心理學者鄭伯壘指出關係網絡的發展事實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但是「爲了方便學術分析與提供學習者瞭解相關模型」，鄭伯壘將關係發展階段區分有「進入」（認識）、「試誤」（變遷）、「穩定」（維持）與「離開」（終止）四個階段<sup>54</sup>。居延安也認為關係有「建立」、「發展」、「衰退」及「終止」的「關係生命過程」四個階段<sup>55</sup>。至於國外 John Egan 研究顧客關係的發展演進時則引用 Dwyer 等人在 1987 年所提論點，將顧客關係的發展區分成「認識」（awareness）、「探索」（exploration）、「擴展」（expansion）、「承諾」（commitment）到「解散」（dissolution）五個階段<sup>56</sup>。試簡述如下：

### （一）居延安的「關係發展生命過程四階段論」

居延安將關係發展的過程分爲四個階段：即第一階段的「關係的建立」，第二個階段的「關係的發展」，第三個階段「關係的衰退」以及第四個階段的「關係的終止」。

<sup>52</sup>張荳雲、譚康榮，同註 43，頁 19。

<sup>53</sup>陳介玄，〈派系網絡、樁腳網絡及俗民網絡—論台灣地方派系形成之社會意義〉，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編，《地方社會》（台北：聯經，1997 年），頁 50。

<sup>54</sup>鄭伯壘，《組織網絡的形成及其相關因素的探討》（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1996 年），頁 12-18。

<sup>55</sup>居延安，《關係管理—企業的虛擬發展與人本再造》（*Relationship Management*）（台北：楊智文化，2003 年），頁 292-311。

<sup>56</sup>John Egan、方世榮譯，《關係行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台北：五南圖書，2002 年），頁 194-196。

### 1、第一階段：關係的建立

居延安以美國學者 L. Altman 與 D. Taylor 在 1973 年提出之「社會滲入理論」(Social Penetration) 來說明關係的建立。該理論認為「潛在關係夥伴」剛開始建立關係時係靠著直接的接觸或者是間接的透過朋友、同事的介紹，但是無論是用直接或間接方法總是免不了潛在關係夥伴的親自交流和溝通。關係建立初期還要考量其必要性、雙向選擇問題、初期互動問題、遊戲規則，因此往往需藉助社會禮儀與遊戲規範來指引相互之間的互動。例如「自我介紹」、「以禮相待」、「投石問路」等都是陌生人之間開始交往所必須遵循的遊戲規則。

### 2、第二階段：關係的發展

潛在關係夥伴一旦建立起關係後就進入關係的發展階段。新建立的關係中，關係夥伴彼此間對對方的經驗和角色、能力瞭解不多，雙方一般都會進行試驗、整合和遵循互動遊戲規則，使得「關係文化」逐步形成。所謂關係文化是指關係夥伴在建立關係過程中所形成的行為模式、價值規範、象徵系統的總和。關係夥伴角色的相對確立是關係走向發展階段的重要標誌，因此，關係發展的過程也可以說是關係文化逐步建立的過程。

### 3、第三階段：關係的衰退

關係發展到什麼時候會開始衰退並無定論。但是關係衰退呈現的就是關係夥伴之間逐漸的停止了對關係「生命之樹」進行「澆水施肥」所外顯的關係冷淡、激情喪失，或是衝突。

### 4、第四階段：關係的終止

在經歷了關係衰退階段之後，大概都已有關係終止的心理準備。居延安認為關係終止似乎是一場悲劇的錯誤觀念需要予以糾正。他說事實並非如此，有許多關係是「自然中斷」或者是「好聚好散」。

## (二) Dwyer 等人的關係發展演進五階段論

John Egan 引用 F. R. Dwyer 和 P. H. Schurr 以及 S. Oh 等三人於 1987 年所提的「顧客關係發展五階段論」，認為關係的發展從「認識」(awareness)、「探索」(exploration)、「擴展」(expansion)、「承諾」(commitment)到「解散」(dissolution)有五個階段，通常都需要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演進：

### 1、認識 (awareness)

「認識」意指一方認知另一方是「一個可行的溝通對象」，互動雖已就此展開，仍有許多「立場」與「態度」待調整來提高彼此之間的吸引力。

### 2、探索 (exploration)

「探索」指的是彼此在關係互動中「搜尋與嘗試」的過程，潛在的關係夥伴會考慮建立關係所應承擔的「義務、利益及負擔」。在此探索階段有五個互相「找尋與嘗試」的步驟，分別是吸引、溝通與協商、權力的發展與運用、關係的規範化以及期望的發展。

### 3、擴展 (expansion)

「擴展」意指關係夥伴所獲得的利益持續增加，彼此間的相互依賴亦提高。它與前述探索階段之最主要區別在於雙方不但已有初步的信任與相互的滿意，更願意增加「風險的承擔」，彼此之間互相傳遞資訊、提供協助以及對方困難時伸出援手等使關係發展得更為穩固。

### 4、承諾 (commitment)

「承諾」指的是關係夥伴願意以隱性或顯性誓約讓關係持續下去。在此階段中，雙方發展出相互預期之角色與確定性，建立了「信任」的效率性 (efficiency) 與效能性 (effectiveness)。

### 5、解散 (dissolution)

「解散」是最後不得已的選擇與可能性，雖然關係的發展未必會走到這個地步，但是關係中止或脫離亦是完整模型的一部份，還是有可能發生的。

## (三) 鄭伯壘的關係網絡發展四階段

鄭伯壘在研究組織網絡發展的形成是採取「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他認為關係的建立、演變與消長有「進入(認識)」、「試誤(變遷)」、「穩定(維持)」與「離開(終止)」四個階段。

### 1、第一階段：進入(認識)

鄭伯壘引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教授 Andrea Larson 之研究，認為人際關係發展初期，潛在關係夥伴建立關係會考量「之前的關係」(prior relations) 和良好的「信譽」(reputations) 之「雙元」(dyads) 因素。這兩個因素可減低雙方互動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也可以增加預期及加強早期合作的機會。Larson 指出建



立信任的前提是「誠實」，有了誠實才可談信任，信任與誠實是人們建立人際關係的基礎<sup>57</sup>。印地安那大學商學所教授 Dollinger 則指出，關係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會由雙方先建立互動關係，彼此經過互動，看雙方交往是否有利，找出交易或互動的最大效益及最小成本，並設法提高自己在互動網絡中的地位，進行「損益矩陣」(payoff matrix)<sup>58</sup>。因此，在建立新的關係過程中，關係夥伴互相之間一般都會進行試驗或探索。

## 2、第二階段：試誤（變遷）

由於關係夥伴雙方因瞭解不夠，會進行試驗來看對方是否稱職。鄭伯壘引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商學研究所教授 Hans B. Thorelli 於 1986 年發表的「網絡動力四階段論」(Network Dynamics) 理論指出，在潛在關係網絡參與者在建立關係的第二階段的「定位」(positioning) 與第三階段的「再定位」(repositioning) 過程中，常會以「經濟基礎」、「科技」、「專業」、「信任」、「合法性」五個因素互動來相互評估克服關係進入之障礙，並在網絡關係中「定位」(position) 自己的位置<sup>59</sup>。

## 3、第三階段：穩定（維持）

關係建立 (Conditions to Build) 時，關係夥伴雙方在經濟利益上的「互惠」(reciprocity) 以及心理感情上的「互信」(trust) 則是建立彼此關係網絡所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此外 Thorelli 強調在關係網絡上「個人特有的」(person-specific) 人格特質、權力、專業、可信賴的感覺與社會連結要比組織所賦予他的關係網絡來得重要。

## 4、第四階段：離開（終止）

關係從「衰退」(decline) 到「脫離」(Exit) 之前的整個過程可說是定位與再定位「循環持久不斷的歷程」(perpetual process)，關係中斷或脫離的可能性是「關係發展」階段完整模型的一部份。

綜上所述，居延安的「關係生命過程四階段」以及 Dwyer 等人的「關係發展五階段」的概念和鄭伯壘的「關係發展四階段」、都有共通性以及可以相互印證的，作者試做簡表如下：

關係發展階段的比較：

<sup>57</sup>Larson, Andrea “Network Dyads in entrepreneurial settings: A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of exchange relationship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1992), pp.85-97.

<sup>58</sup>Dollinger, Marc J. “The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strategies in fragmented indust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15. No.2 (1990), pp.272-279.

<sup>59</sup>Thorelli, Hans B. “Network: Betwee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7, (1986), pp.42-44.

關係發展 理論 發展階段	居延安 (2003) 關係生命四階段	Dwyer et al (1987) 關係發展五階段	鄭伯壘 (1996) 關係發展四階段論
第一階段	1、關係建立時期：潛在關係夥伴開始接觸時，常需藉助社會禮儀與規範來引導彼此的互動行為。	1、認識階段：若一方認知另一方是「一個可行的交易對象」，互動就此展開。	1、進入(認識)階段：在此階段有賴於「之前的關係」與個人「聲譽」。
第二階段	2、關係發展時期：互動雙方的角色經過試驗和確立，彼此遵守遊戲規則，「關係文化」自此逐步形成。	2、探索階段：在找尋與嘗試的過程中，彼此吸引、溝通、運用權力、關係的規範及相互期望對方角色為何來進行相互探索。	2、試誤(變遷)階段：雙方因瞭解不夠，會進行測試對方是否稱職，「角色」的確立是關係再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階段	3、關係衰退時期：關係夥伴間若停止對關係的生命之樹進行澆水施肥可能呈現關係冷漠現象。	3、擴展階段：雙方已有初步的信任與相互滿意，彼此相對應之互賴性提高。	3、穩定(維持)階段：個人的人格特質、權力、專業、可信賴的感覺比組織所賦予他的關係網絡更重要。
第四階段	4、關係的終止：彼此關係會因感情冷淡或是衝突而中斷或是好聚好散。	4、承諾階段：雙方發展出相互預期之角色、信任或承諾使關係得以延續下去。	4、脫離(終止)過程：關係中斷或脫離的可能性是完整模型的一部份。
第五階段		5、解散階段：關係發展未必會至此地步，但關係中斷或脫離也是模型的一部份。	

## 肆、研究方法

### 一、研究方法

在方法論上，「質的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可使研究者分享和了解研究對象的主觀想法，了解研究目標之過程、事件、關係、社會環境的背景脈絡<sup>60</sup>。本文有關國民黨基層黨工關係發展的研究，主要係描述性與探索性(exploratory)的研究，因此針對苗栗縣現任、退休黨工的關係建構和發展以「個

<sup>60</sup>Chava Frankfort-Nachmias & David Nachmias 著、潘明宏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下》(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台北：韋伯，1999年)，頁 195-221。

別深度訪談」(individual face-to-face interview)與「焦點團體座談」(focus group interview)予以研究。

### (一) 個別深度訪談法 (individual face-to-face interview)

個別深度訪談法是「質化訪談」(qualitative interview)的一種，它是研究者針對研究旨題與受訪者之間的概略互動，並不使用一定用詞與順序的問卷來詢問特定的問題。換言之，個別深度訪談的本質是使受訪者願意敘述其過去的生活史，或說明發生在過去的事(something happened in the past)。它突破傳統上取自於文字來源的歷史限制，尤其適合用於較少使用文字的弱勢者，它的重要性就在於其能戳破時空、重新建構歷史的積極意義。而訪員也有其能力，使個別角色在訪談中得以發揮，因此最理想的情況是由受訪者負責大部份的談話。雖然個別深度訪談法是以個人經驗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並非社會學的主流，但是越來越多的社會學者已體認到其在歷史學領域上的重要性<sup>61</sup>。

本文採取「標準化開放式訪談」(standardized open-end interview)方式，將歷史的取材、資料來源與詮釋權回歸於國民黨基層黨工，讓他們暢談在歷史脈絡中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建立人際關係網絡與社會群體間的關係，並藉由探討影響關係網絡建立的結構因素及其效果，來分析國民黨黨工關係發展的形成、維繫及其變遷歷程(訪談大綱如附件一)。

### (二) 焦點團體法 (focus group interview)

「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又稱「焦點訪談法」(focused interview)，屬於團體訪問的質性研究方法。它藉由一群參與者在相互激盪中所發表之言論，提供大量的對話內容而獲得相關資料。它可提高團體成員的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程度，所蒐集的資料是以團體成員之間互動討論的言詞內容為核心。特點是可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蒐集到大量的語言互動和對話，由於焦點訪談法允許被研究者陳述其個人之反應資料、特殊情感；同時屢屢激發出超乎研究者意料的焦點，非以個人訪談所可能得到的資料，因此，它具備了經濟便捷性、互動動態性、廣角探索性、意料之外的發現可能性等特質<sup>62</sup>。

<sup>61</sup>Earl Babbie 著、李美華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8th. Ed.) (台北：時英，1998年)，頁455。游清鑫、鄭夙芬、陳陸輝合著，《面訪實務》(台北：五南，2001年)，頁65-68。Floyd J. Fowler, Jr. & Thomas W. Mangione 著、黃朗文譯，《標準化的調查訪問》(Standardized Survey Interviewing) (台北：弘智文化，1999年)，頁75。

<sup>62</sup>李美華譯，同註61，頁385。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1996年)，頁223-237。Richard A. Krueger & Mary Anne Casey 著、洪志成、廖梅花合譯，《焦點團體訪談》(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 (嘉義市：濤石文化，2003年)，頁8-12。黃朗文譯，同註61，頁25。

## 二、研究對象

本文受訪個案的選取係採取「非隨機抽樣」(nonprobability sampling)中的「滾雪球抽樣」法，此法又稱「偶遇抽樣」(accidental sample)。它是透過研究對象的人情連帶，由他建議找出另外其他研究對象的累積過程。而選擇「資料提供者」(informants)係指背景資訊組合相似的人士或團體，亦即研究者可以和他們直接談論該團體所有事務的成員<sup>63</sup>。

位於台灣中北部的苗栗縣，同時集合了客家、閩南、「泰雅」和「賽夏」原住民等多族群的生活型態。本文作者在苗栗縣基層服務二十餘年，並在該縣中港溪、山線客家、海線閩南以及住有原住民、眷村鄉鎮等不同形態的七個鄉鎮以及縣級單位的服務經驗，選擇苗栗縣作為研究對象，既是地利之便，亦有進行深度訪談的人脈奧援實務之利，這是一般學者或研究者所缺乏的條件與視野。

當然僅以苗栗縣的鄉鎮民眾服務站及其所屬黨工為研究對象，有可能會面臨資料蒐集的疏漏及研究面向不足的情形，則有待後續之研究補充。本文採取「立意抽樣」與「滾雪球抽樣」方法，首先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透過關係，聯繫拜訪退休與現職黨工取得其協助後，接著再由這些初始受訪者推薦其他受訪者再逐一聯繫拜訪(訪談名冊如附件二)。在實際執行訪談時確有困難出現，例如有些黨工顧慮職業倫理、業務保密，或存有防衛的心理而出現拒訪或避重就輕情形，均需作者逐一克服。

## 三、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的範圍在時間上，溯自 1945 年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在台建立組織至 2004 年 4 月總統大選之後，大約六十年之久。但是在分析旨揭關係網絡發展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時間長軸上(locus)歷史背景及社會發展之殊異，也就是說時空的差異性。

在有關台灣政治變遷的歷史分期上，學者陳明通將台灣政治變遷的時段分為：一、從台灣光復(1945)到國民黨撤退來台(1949)的「戰後初期」；二、從國民黨撤退來台到國民黨改造、完成土地改革後(1953)的「威權統治重建時期」；三、從威權統治重建期完成到反對黨成立(1989)止的「威權政體鞏固時期」；四、從解除戒嚴(1989)到政黨輪替為止(2000)的「民主轉型時期」；五、從政黨輪替(2000)到目前為止的「政黨競爭期」五個階段<sup>64</sup>。

<sup>63</sup> 李美華譯，同註 61，頁 304-306。

<sup>64</sup>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1995 年)，頁 11-12。

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前黨工謝順欽以其多年主持台灣省黨政關係業務經驗，將國民黨的黨政關係歷程隨國內政治環境的不同區分為：一、民國 39 年（1950）至民國 58 年（1969）的「以黨領政」時期；二、民國 59 年（1970）至民國 66 年（1977）為「以黨輔政」時期；三、民國 67 年（1978）至民國 80 年（1991）為「黨政分工」時期；四、民國 80 年以後至民國 89 年（2000）為「黨政分際」時期等四個時期<sup>65</sup>。

本文作者綜合他們的政治歷程佐以本文之觀察予以區分為：一、自台灣光復（1945）到國民黨改造前（1949）的「台灣光復初期」；二、國民黨改造後（1950-1960）之「國民黨改造後時期」；三、從國民黨改造後（1961）到民進黨成立前（1986）的「一黨獨大時期」；四、從民進黨成立（1986）、解除戒嚴到政黨輪替前（2000）之「民主轉型期」；五、政黨輪替（2000）後的「政黨競爭時期」等五個階段。本文以這樣的五個階段做為黨工關係發展的研究歷史分期，配合前述的關係理論概念進行訪談，來探析國民黨基層黨工在不同階段、不同時代背景的關係網絡變遷過程。

## 伍、黨工關係網絡的研究

社會學者對於社會關係網絡的建立、維持、變遷的研究論點容有相異之處，但基本上均可能會經歷如鄭伯壘的「進入（認識）」、「試誤（變遷）」、「穩定（維持）」、「離開（終止）」四個階段。或如居延安所指的關係的「建立」、「發展」、「衰退」及「終止」的階段。本文認為居延安的關係的生命四個階段論述簡單明白，因此，藉由該理論與國民黨基層黨工的訪談，來瞭解他們建立關係網絡的經驗。

### 一、台灣光復初期（1945-1949）

台灣光復初期，地方行政機關大抵延續日據時期之建制，鄉鎮公所人員大都由政府任命日據時期的街庄役場「助役」來接管並暫代職務。直到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於民國 34 年（1945）12 月 26 日公佈「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成立方案」作為各級議會、鄉鎮民代表及縣、鄉鎮、村里長設置之依據，並進行辦理公民宣誓登記以及公職候選人檢覈，當時辦理公職候選人檢覈多得讓學者有「有知識者不約而同的想走進政治的窄門」之嘆<sup>66</sup>。

而早在民國 31 年（1942）9 月始，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即開辦「台灣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由翁俊明兼班主任，招考首批台籍或閩、粵籍青年學員六

<sup>65</sup> 謝順欽，〈黨政關係六十年回顧〉，謝鴻儀主編，同註 3，頁 92-98。

<sup>66</sup>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社，1993 年），頁 16-18。

十人，受訓三個月，派往到台灣地方從事黨務工作<sup>67</sup>。因此，台灣光復初期的黨工可說並非台籍人士擔任，他們是以開疆擴土的精神到各鄉鎮發展黨務。

### （一）關係建立階段

「信任」是關係建立時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個人長期經營關係網絡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取得他人的信任，進而因受到他人的信任而獲得友誼<sup>68</sup>。受訪之退休黨工表示，他在民國 35 年從中國大陸到台灣地方從事黨務工作時，台灣地方上就已經成立有區黨部委員會的組織和黨員，那個時候鄉鎮長擔任常委，委員有代表會主席、學校校長等。而他到地方的第一個關係建立對象就是當地的鄉鎮長，獲得他的信任進而得以發展組織。他們在關係的建立上則是先從拜訪認識黨員開始，再由黨員以關係連帶來介紹認識其親朋好友，再循線串聯起全面的關係網絡。

.....在（民國）35 年的時候.....被派到「大台中縣」的埔里做區黨部的工作.....（R2-2）。.....35 年就有區黨部委員，委員是推薦的，鄉鎮長當常委.....（R3-2）。到區黨部第一個我是找鄉長，要跟鄉鎮長關係搞的很好.....然後拜訪黨員.....我是先認識黨員，由黨員介紹認識其他人（R4-1）。

### （二）關係發展階段

關係發展的過程會有如 Dwyer 等人所指的「擴展」和「承諾」階段。「擴展」意指關係夥伴經歷過探索階段後，雙方已有了初步的信任與相互的滿意，而彼此間的相互依賴也相對的提高。黨工在地方以拜訪來和黨員博感情及廣結善緣，他們的關係發展途徑卻是關係取向的。

區書記要跟鄉鎮長關係搞的很好，黨政關係搞好，工作順利推展。區書記和幹事要吸收黨員，編小組，召開小組會，所以一部份也要靠自己建立關係.....（R4-5）。

---

<sup>67</sup>陳三井，同註 3，頁 120-124。

<sup>68</sup>Tom Richardson, Augusto Vidaurreta, with Tom Gorman 著、劉慧清、江郁清譯，《關係是一種策略性資產》（*Business is a contact sport*）（台北：臉譜，2003 年），頁 163；羅家德，同註 44，頁 117。

### （三）關係衰退階段

民國 36 年的「二二八事件」及後續整肅行動所引發的省籍、族群爭議成爲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關係疏離的最大原因。至於在微觀之個人方面，黨工與地方幹部關係的變化或中斷來自於選舉「提名制度」，受訪黨工表示：

我到 36 年成立區黨部以後，正好 36 年 2 月 28 號發生 228 事件，當時……暴民……，把我抓起來……。戴村長從外面跑回來，跟暴民說這個人不能殺，他是我好朋友，因此暴民就沒殺我，……。(R2-2)……影響關係變化的原因就是選舉，你提名這個，他很高興，別人不高興，就不理你。…… (R4-3)

### （四）關係終止階段

黨工與黨員、政治人物關係終止的原因源自於當時選舉提名作業、利害關係、政經利益或缺少互惠。退休黨工說道：

……影響關係變化的原因就是選舉，你提名這個，他很高興，別人不高興，就不理你。(R4-3)

## 二、國民黨改造後時期（1950-1960）

國民政府於民國 38 年撤守台灣之後，國民黨認知必須依賴本地的菁英才能掌握社會。在黨的改造時參考美國政黨機器的架構，在各地成立民眾服務站，開始招聘本省籍青年從事地方黨務工作。民國 41 年之後，國民黨地區黨部以「民眾服務站」爲名，以提供獎助學金、法令解答、技藝訓練、民眾補習教育、圖書閱覽、協助救災、急難慰問扶助、替民眾代寫書信訴狀、調解糾紛、義診的服務方式，試圖以此方式讓民眾獲得好感。

### （一）關係的建立階段

民眾服務站在全省各地成立之後，所招募的黨工的條件除了要具備高學歷、熱誠、在地人以及與當地民眾沒有語言隔閡的鄉土優勢外，也要求他們勤跑基層，召開小組會議，透過服務工作建立起人脈關係並藉此贏取民眾的好感。

民國 35 年到 45 年之間，那個時候是 18 鄉鎮各顯神通，有借寺廟辦公的、有租的、有向鄉鎮公所借一張桌子辦公的……（L3-1）。黨工的條件，我想應該是要地方人，那時後的學歷要求是要高中畢業以上，還要到省黨部考試……（L2-2）。當時黨務基層的工作要求從基層小組做起，所以每天早晚都要去各里各里的去召開小組會……（C3-2）。……我們跟基層的鎮公所、農會、衛生所人員有感情外，跟一般民眾也都會認識。所以，你在基層跑，大家都會認識你（C4-1）。

## （二）關係的發展階段

國民黨地區黨部對外以「民眾服務站」為名，提供文康服務、圖書閱覽、急難慰問、替民眾代寫書信訴狀、調解糾紛的服務方式讓民眾好感，藉以穩固關係。

……在 43、44 年的時候，……我們就成立「民眾夜校」，自己編教材，……對於掃除文盲的工作做起來很有意義（H3-1）。

……那個時候比較多土地、房子糾紛，……部隊演習的時候破壞老百姓農田，都要靠民眾服務站出面來協調，……（C4-2）。

## （三）關係衰退階段

影響黨工關係衰退的原因，源自於輔選成敗定英雄是黨工必然的宿命。選舉後的論功行賞的升遷他調，或者是輔選失利的人地不宜。職務調動到新的環境開展工作，都可能中斷了黨工原有服務鄉鎮所辛苦建立的關係。受訪黨工表示：

當然利益衝突，比如沒提名他，或是提名他的對手，也是關係變化的原因（T4-3）。影響關係變化的主要原因，還是在調職，一方面是時間不允許，一方面是調到一個新環境，要重新開始認識一批人（H4-2）……。黨務工作從來就沒有所謂的好做過！所謂好做，只是人家選舉的時候回報你溫情，讓你覺得心血沒有白費……（H6-1）。



#### (四) 關係終止階段

對國民黨地方區黨部來說，贏得輔選與執政是它的根本任務。因此，選舉提名作業所引發未被提名者的反彈衝突、疏離或來自得不到政治資源者「利益」衝突因素使然，都是黨工與當地黨員或民眾關係終止的原因。

.....國民黨對於違紀參選的派系領導人開除黨籍，派系人物-要嘛，怕！接受國民黨勸退，不選了。要嘛，違紀參選到底.....或者乾脆變成反對黨。(L6-2)

### 三、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 (1961-1986)

國民黨地方黨部的存在是因為它能夠實現地方政治人物的利益，因此政治人物會考量經濟理性，例如權力資源的交換、爭取選舉的提名及考量未來的政治發展前途，以政治上的忠誠交換國民黨對他們未來的發展前程。所以黨部賦予了基層黨工在當地社會中扮演社會協調、溝通、領導之的關鍵角色和地位。

但是黨工在地方要建立關係與獲得關係網絡的擴展與穩固，他們仍須付出心力才能獲得。所以，黨工仍需主動拜訪、與黨員互動、召開會議、舉辦活動、參加婚喪喜慶融入當地社會，以密切的互動來穩定關係。隨著彼此認識時間的增長，可以和黨員相互傾訴及互惠性的內容擴展、情感漸趨緊密，而他們的表現若被當地人士接納，與地方領袖建立情誼，他們才能掌握地方公共事務的脈動。

#### (一) 關係的建立階段

黨工在政黨組織系統建立穩固之後，他們在關係網絡的建立和方式即循著「關係文化」模式主動拜訪模式進行，方法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也就是說，他們是由現職黨工引領新人介紹拜訪，有關係拉關係的方式建立起網絡關係。而他們表示真誠、人格值得信賴是他們和黨員民眾建立良好關係的方式。

.....強調清廉第一，不貪不取，重視品德操守，.....不要給人做文章，幹部相信我言行一致，可以信任，這就是我獲得他們信任的地方...(C4-4) 關係的建立，第一就是職務上關係。另外就是親友跟同學的私人關係，建立在公、私誼.....還有老同事帶著去認識地方人士(S1-1)。那時前輩、同仁會帶我們一一去介紹認識、打點關係.....(F1-1)。我們新人通常是由主任、前輩帶領這樣去認識地方人士.....

(D1-1)。「真誠、信賴與接納」是我和黨員民眾保持良好關係的方式……，能夠完成長官交付的政治任務，自然有我的一套工作方式，而這種方式就要靠一顆好的「心」來支持 (P4-4)。

## (二) 關係的發展階段

國民黨實施義務幹部制度讓更多黨員參與黨的活動，由於義務幹部大都具備熱心服務的人格特質，且背景愈相同愈有利於信任之建立的特點，他們與黨工之間自然形成「強連帶」的關係網絡，而不同的義務幹部類型也可以讓黨工透過他們將人際關係網絡拓展得更寬廣。黨工與當地黨員民眾建立關係的模式既定，因此拜訪互動、會議活動、服務與參加婚喪喜慶仍是他們建立關係的主要工作方式。

……八卦村沒有電，點那個石油燈，……經過我們溝通陳情，全村將近 100 戶人才開始有電，這是我印象最深也是那時黨部服務的效果 (W3-3)。

……用真誠的聯繫、關懷和問候，由幹部、黨員、鄰居、民眾同心圓向外擴散逐漸熟悉，同時也以活動的推展，作為服務的橋樑，廣結善緣…… (P4-1)。黨務工作就是人際關係工作，黨工在地方事務中必須……想到你是可以提供「服務」的，而且是熱心的、可以託付的人，這樣你被人家信任，黨員民眾有問題第一個找你 (T5-1)。

## (三) 關係衰退階段

隨著黨員人數的增加，國民黨組織內部存在著上對下的僵化體系，缺少了對上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長期下來使得黨員感覺其意見無法受到尊重，大多數黨員也沒有機會參與決策。加上當時「黨外」運動的風起雲湧，政治意識型態、選舉立場與提名與否的對立，或者是利害關係的取捨，都可能產生政黨疏離感。

此外，台灣自 1970 年代起兩岸關係與台灣的主權地位成為反對運動衝撞國民黨執政當局的政治訴求。因此，統獨議題勢必都有言論市場與投票支持者。統獨的認同分歧也愈來愈與政黨認同有密切的關係，甚至成為政黨投票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所以，國家認同與省籍情結在這段時間影響了台灣政黨競爭的基礎

<sup>69</sup>。自 1984 年以來的實證資料分析中顯示，省籍、國家認同與政治價值等三種分歧是台灣政黨競爭與動員選民的基礎，也是主導台灣選舉的關鍵議題<sup>70</sup>。

民國六、七十年代國民黨面對當時「黨外」的挑戰與國際地位的不利，已感受到不得不朝本土化轉型的壓力，台灣省黨部主委宋時選當時引進救國團「親切、自然、實在」作風帶入國民黨組織體系中，要求黨工在工作方式上予以轉型來與黨員民眾建立互動關係。

到七十年代後，美麗島事件是一個分水嶺，解嚴的同時國民黨的權力慢慢削弱……（J3-1）。……還有宋時選要求的「親切、自然、實在」也是黨工建立與黨員或民眾關係最重要的因素（L4-4）。至於國家認同，國民黨自詡為中華民國的捍衛者，但當台灣本土意識高漲的時後，……就勢必會造成國民黨的兩難……（G5-2）。

#### （四）關係終止階段

在地方選舉過程中，黨員對於提名作業的不諒解依然是黨工與其關係網絡中斷或受到影響的最主要原因。

……每一次選舉就有一批黨員對組織不諒解，我想這是今天國民黨長期執政所造成的包袱（Y4-3）。

#### 四、民主轉型期（1986-2000）

社會價值日趨多元化，政黨意識薄弱是正常的現象，人們對政黨的需求，可從意識形態的效忠至符合本身需要的利己主義型態之間作選擇，使得黨工平時建立的關係網絡與選民選舉投票行為之間「不必然」有正相關。隨著社會變遷與台灣本土意識的高漲，在選戰中這種人情交往、關係連帶的方式將不若心理的意識型態管用。

<sup>69</sup>徐火炎，〈選舉與台灣政黨重組的趨勢〉，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7年），頁256。

<sup>70</sup>徐火炎，〈台灣的選舉與社會分歧—政黨競爭與民主化〉，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1998年），頁163。

### (一) 關係建立階段

由於關係文化已逐步形成，所以黨工在發展其關係網絡的方式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基本上還是以主動拜訪，有關係拉關係的方式建立他們的網絡關係。

我認為獲得黨員和民眾的信任最重要，無信不立，要當黨的領導幹部一定要獲得人家信任，否則調解糾紛、派系協調怎麼會讓人信服，所以我個人認為公正、有信用很重要…… (L4-4)

工作上我覺得組織所提供的網絡關係是好比是靜水，自己去跑、去經營的才是活水，靜水能變成活水，必需再付出更大的代價，…… (J4-5)。

### (二) 關係發展階段

在此時期，國民黨因組織系統龐大、黨員分屬於十八個省級特種黨部，黨籍各有隸屬，彼此之間平時欠缺橫向聯繫，產生了黨員聯繫及向心力式微等問題。而黨工關係網絡的發展仍係以推銷自己、親自拜訪的方式來進行。

黨工最重要一件事是會認人、在最短時間會記住人，而且要平易近人。……最好是親自拜訪，平時就要做好聯繫服務，……。常出去曬曬太陽，走出辦公室，才有人脈，…… (J4-2)

### (三) 關係衰退階段

近二十年來台灣頻繁的選舉，統獨意識、省籍的對立操弄與政治動員逐漸撕裂了地方社會中人際情感，朝野政黨極力爭取其基本票源與選民認同的同時，也喪失了另一個區塊的群眾基礎，1996 年總統大選後，國民黨開始檢討其組織架構是否合乎時代趨勢，「選舉機器」之議浮上檯面<sup>71</sup>。

……10 年前選舉，民進黨出來，民眾可以選擇就不一樣了，……黨工平時的服務已經沒有效果，沒人領情，……國民黨做好是應該，做不

好被罵得體無完膚……（L6-1）。……當社會不斷進步，黨部很難以所謂的交情來維繫關係，……（G4-4）。

#### （四）關係終止階段

國民黨民眾服務站以三至五人的編制，卻要處理地方錯綜複雜事務和推動政黨工作，而在選舉過程中，常見黨員提名落空致對黨部不諒解，以抗議提名不公為由退出國民黨。這種「權力」與「資源」的無法獲得，是黨工認為係其關係網絡中斷的主要原因。

……十年前的人就開始有利益、黨派、省籍情結衝突，這都是選舉和政黨競爭惡化民風的後果，雖然民主了，但民心已不古了，黨務工作也面臨苟延喘息的局面……（T6-1）

### 五、政黨競爭期（2000--）

微電腦、通訊系統與網絡技術的資訊技術革命，根本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這種人類心智的根本轉變可以稱得上是「革命」<sup>72</sup>。網際網路(Internet)與「電子郵件」(E-mail)已是政治人物的新疆土，讓競選活動帶來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新契機<sup>73</sup>。網際網路(Internet)的方便、互動、沒法管特性，顛覆了傳統資訊及意見的傳播管道，使得網路使用者具有強烈的功能導向。政黨或候選人可以動員網友以電子郵件或網路動員來進行宣傳或群眾運動。因此，傳統依賴人脈關係的「兩階段傳播」模式已然崩解，改由網路取代<sup>74</sup>。

#### （一）關係建立階段

關係的建立是潛在關係夥伴之間靠著直接接觸或朋友同事的介紹，認識另一方是可行的交易對象的過程。從受訪黨工所描述的「不管在任何階段，黨務工作

<sup>71</sup> 葛永光，〈選舉機器的理論建構-兼論國民黨的黨務改造方向〉，《理論與政策》，1996年，頁136-148。

<sup>72</sup> Manuel Castells 著，夏鑄九、王志弘等譯，《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台北：唐山，2000年)，頁34-36。

<sup>73</sup> Dick Morris 著，張志偉譯，《網路民主》(Vote.com) (台北：商周，2000年)，頁129、150。

<sup>74</sup> 吳崑玉，〈網路政治：一個顛覆性的時代〉，《Catch 選舉》(第5期，1996年)，頁32-33。

就是人際關係的經營，必然的要主動去認識週遭的人」。國民黨黨工面臨多黨競爭情勢依然是沿用舊法來建立他們的關係網絡，幾位年輕現職黨工表示：

我基本上是從鄉鎮市長、村里長、曾任公職或公務人員來開始認識，再擴展認識到村里小組長、區分部委員、社團幹部.....建立自己的人脈.....（Y4-1）。.....只要你勤於訪問，確實對建立關係很有幫助，.....對地方人士在最短時間就能互相熟悉。.....（A4-1）

## （二）關係發展階段

黨工在此時期除了沿襲拜訪、活動與服務來建立其關係網絡之外，義務幹部制度也提供黨員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管道，因此強連帶的關係網絡然存在著。

.....我們也提供很多舞台，.....我們聘他擔任義務幹部就有讓他在地方上表現的機會，讓他提高知名度.....去認識、發展、去結交更多的人（D2-1）。

## （三）關係衰退階段

國民黨受困於心理層面上之統獨認同與省籍困擾，而資訊科技的進步也取代了人際網絡，國民黨透過黨工建構基層人脈關係網絡的方式疲態已露。黨工投入極大心力和資源建構其關係網絡，卻必然的面臨關係的冷淡、衰退、脫離，即因我們已經是處於一個社會變遷的時代。

資訊的發達取代了黨員的參加活動和聚會意願，也取代了民眾對政黨的依賴和需要.....（T5-2）。網路上言論常帶動民意與人心，掌握網路和大眾傳播媒體，自然能夠網羅民意。.....（J5-2）。

## （四）關係終止階段

國民黨在 2000 年總統選敗選後進行其黨務改革檢討，除精簡裁員大半黨工外並實施鄉鎮市黨部的合併，因此各鄉鎮市民眾服務站的功能性已不若以往，也

不復往日門庭若市景象<sup>75</sup>。一位退休黨工受訪時感慨的表示「黨工即將走入歷史」，道出了這個趨勢之可能。若果真如此，本研究在因緣際會中竟詮釋了民眾服務站和無數基層黨工的歷史，為基層公共事務的運作過程留下了些許紀錄。

由於過去國民黨區黨部是以鄉鎮為單位，區書記在一個鄉鎮活動，現在變成一個區書記要面對二至三個鄉鎮，很難面面俱到，基層實力已大不如前，而且專職黨工變少了……（K6-1）

## 六、研究討論

社會學家 Amitai Etzioni 曾言「社會變遷是社會現象的改變，對社會變遷作研究可說是社會科學的重點，嘗試著探索這些現象與過程的機制，即掌握了時代脈動的精神」<sup>76</sup>。台灣光復後經歷了「二二八」與白色整肅、國民政府遷台與戒嚴、動員戡亂變局，國民黨民眾服務站的設立舒緩了基層社會與國民黨的緊張關係。之後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情形下，中央的「萬年國會」與地方自治並存，關係連帶的講求與運作就成為當時地方層次選舉的特色。我們可從歷次選舉觀察，在七〇年代前，黨外候選人的問政或選舉策略雖曾有省籍訴求，但國家認同問題並不突出。基層的鄉鎮市長、縣市議員、村里長、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社會關係的運作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換言之，在 1980 年前，社會關係網絡是政黨或參選人動員選民的基礎<sup>77</sup>。

國民黨為了掌握台灣基層社會因此在各地設立「民眾服務站」，透過服務途徑來與民眾接觸，並藉由黨工擴展關係，早期確實拉近了國民黨與民眾的距離。誠如受訪黨工所言「以前農業社會大家重感情，只要肯努力，服務工作做得多，關係好、認識人越多，選舉的時候就會獲得回報，讓黨工覺得服務或關係建構的心血沒有白費」，我們當可了解到關係網絡在當時的選舉中是必要的因素。

但是隨著社會變遷，這種人情交往的方式已隨著時空環境的變化在選戰中逐漸不管用。即便受訪黨工均認為他們真誠、值得信賴、熱心、可以託付和勤跑基層，他們平時建立的關係網絡在近幾次大選結果顯示已不若以往，因此關係衰退的原因就是我們所要探悉者。我們了解選舉的投票行為是受到許多複雜的因素影響的，例如意識型態、社會關係網絡、候選人的形象、公共政策、政黨表現和形象、社團身分、家庭社會化、甚至經濟景氣等。由於選舉是台灣社會中最大規模

<sup>75</sup> 聯合報，民國 91 年 10 月 2 日，雲林縣地方新聞，版 18。

<sup>76</sup> 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1995 年），頁 181。

<sup>77</sup> 陳明通、林繼文，〈台灣地方選舉的起源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 年），頁 23-70。

的政治動員和政治溝通的時機，政黨不可能不利用選舉期間宣示它的主張與理念，來鞏固其原有的社會基礎並同時尋求與擴充新的社會支持<sup>78</sup>。

從本文「民主轉型」時期近二十年的選舉過程與結果觀察，民進黨以省籍情結和台灣獨立意識型態作為政治號召，找到了支持它這個政黨力量的支點和社會基礎<sup>79</sup>。他們以省籍、國家認同、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作為政治訴求，已取代過去的政策政見或人情關係連帶。因此，徐火炎指出「台灣的選舉競爭基本上並非歐美社會的政策功能性投票傾向，而是民進黨以省籍、國家認同做為選舉文宣訴求，如此必然使得人心衝突」<sup>80</sup>。

在民主時代，除了政黨核心選民或稱「死忠支持者」是由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構成的之外，那些人數眾多，在各黨派之間或搖擺不定或不關心政治或對選情冷漠的「沒有明確意向」中間選民，卻是所有政黨必須利用選舉廣告竭力來拉攏爭取這些游離選民的選票。而政黨所用的手段卻是以投民眾之所好的形式，讓步來迎合選民的「非政治的消費態度」，也就是我們在所俗稱的「政見或牛肉在那裡？」。他們期待著獲得提供較高的退休津貼、老人年金等政策利多的社會福利供給。因此政黨為了贏得選票，除了要排除對其不利之投票因素、塑造領袖或候選人良好形象，尚需提供「公共性動因」如安全、安定保障以及改革社會福利體系之做法與訴求<sup>81</sup>。

面對此種情勢，國民黨黨工表示「關係歸關係，選舉是另外一回事，選民的選票投給誰已是選民的自由意志」，這點讓黨工感覺到人情變薄。關係網絡在近幾年的選舉動員的效果已是每下愈況，因此黨工本身覺得「在當前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亦不復往昔重要」。國內媒體報導國民黨中央「黨務改革小組會議」將大幅精簡及裁減現職專職黨工<sup>82</sup>，對此趨勢退職黨工詹碧霞數年前即已感慨基層黨工一定會被「扔進垃圾桶」的宿命<sup>83</sup>。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進程，我們或許已可見到民眾服務站和及基層黨工將悄然邁入歷史。

國民黨黨工關係網絡在面對弱連繫的橋樑作用理論、資訊網絡社會的來臨以及民進黨的非公共政策議題等的競爭情勢，顯然已難發揮它在大選中的動員效能。對於此種情形，哈伯瑪斯指出，政黨雖然可以用意識型態號召選民進行政治動員，但面對時勢所趨，仍不得不用盡一切方法、甚至無所不用其極的來爭取選

<sup>78</sup> 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 期（1992 年），頁 33-61。

<sup>79</sup> 陳安，〈關於中國大陸民主化動力問題的比較研究〉，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1998 年），頁 481。

<sup>80</sup> 徐火炎，同註 69，頁 163。

<sup>81</sup> 曹衛東等譯，同註 27，頁 277-286。

<sup>82</sup> 中國時報，民國 93 年 4 月 27 日，版 A2；中國時報，民國 93 年 5 月 4 日，版 A4。

<sup>83</sup> 詹碧霞，同註 37，頁 211、頁 324-326。



票以鞏固其政權。因此他不禁慨嘆「如果一個政黨，沒有正式黨員，而僅僅在選舉期間才活躍起來，集中運用廣告策略，那麼，這對於它是多麼的有利」<sup>84</sup>。

學者張茂桂表示「社會研究的進展，不可能完全脫離當代重要關懷。在對於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系統的剖析中，我們得以生產、累積新的知識。但是真正好的研究，必將超過當下眼界的侷限，經得起時間的考驗」<sup>85</sup>。近幾年網際網路與電子郵件的運用已改變了選舉行為，尤其在都市化地區、35歲以下的年輕人已在網路上形成新的樁腳系統，他們顛覆解放了傳統的政治或選舉樁腳，使得網站成為無形的樁腳。誰能在網路上提出意見，誰就能掌握了傳統樁腳或民意代表所具有的功能。換言之，網路的發展已經改變了利益交換的程序、壓力團體的形成過程以及政治力量集結的方式，導致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完全依賴人際關係網路所建構的政治體系，當然逃脫不了變革的命運<sup>86</sup>。

最近十餘年來，整個世界政經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已遠遠超越過去農業社會時代人們之想像。馬克思主義者史勒（Herbert I. Schiller）就認為「資訊在當前時代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成為關係發展的核心，資訊的生產與傳輸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活動」<sup>87</sup>。從之前南韓總統盧武鉉、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的選戰觀察，他們透過網路 internet 號召年輕人投票、募款、發表政策等，不僅改變了傳統選戰方式，更是吸引年輕人接觸政治的最好方式<sup>88</sup>。根據美國的選舉趨勢分析，在過去十幾年當中，18至19歲的選民投票率下降達50%，而使用網際網路 Internet 者恰好大部分是這個年齡層的人，尤其是現在20至30歲的新新人類，他們是民意調查找不到、新聞廣告打不到的政治冷感族群，但他們卻是網路上最常見的顧客，所以在選戰中運用網際網路的效果將是往後政黨所必需正視者<sup>89</sup>。

科技時代打選戰，無線電話手機的「簡訊動員」已經使過去依賴傳統關係網路的方式產生重大變革。例如韓國總統大選中候選人盧武鉉選前情勢危急，他在投票前夕大量發送手機簡訊抗議「財團誤國」，一舉扭轉選舉劣勢而當選韓國總統<sup>90</sup>。在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中，「簡訊動員」也成為強化選舉及造勢的新利器。因手機簡訊可在選戰造勢、文宣活動及各種動員通知中發揮極大的效果，三二〇總統大選前一天，手機簡訊單日超過兩千五百多萬通，催票簡訊也比平日成

<sup>84</sup> 曹衛東等譯，同註27，頁263、頁273。

<sup>85</sup> 張茂桂，〈探索台灣權力統治的三把入門鑰匙〉，《新新聞週報》，第539期（1997年7月），頁84。

<sup>86</sup> 吳崑玉，同註74，頁32-35。

<sup>87</sup> Frank Webster 著，馮建三譯，《資訊社會理論》（Theories of Information Society）（台北：遠流，2001年），頁152-153。

<sup>88</sup> 林智清，〈世界資訊網路將成選戰新利器〉，《Catch選舉》，第1期（1995年），頁43。

<sup>89</sup> 簡大森，〈選舉走上資訊高速公路〉，《Catch選舉》，第1期（1995年），頁42。

<sup>90</sup> 聯合報，民國93年1月27日，版A4。

長數百倍，陳水扁靠三一九槍擊受傷簡訊動員來扭轉選舉劣勢，突顯手機簡訊的力量不容小覷<sup>91</sup>。因此，無線電話手機「簡訊動員」將是今後強化選務、選舉文宣、造勢活動、催票動員、澄清重大選情的主流。無線電話手機的「隨身攜帶」方便性、「無遠弗屆」的寬廣性，加上「立即顯現」、「立即傳播」的快速性，將使其傳播通訊動員效果更益擴張，也證明了管諾維特的「弱連帶優勢」理論在現今社會中關係連結的重要性。

## 陸、結論

本文的目的在於了解國民黨民眾服務站基層黨工透過其關係網絡和關係連帶來維繫它的政權基礎。因此，藉著居延安的「關係生命過程」中關係的建立、發展、衰退及終止四個階段；鄭伯壘所認為的關係發展有進入、試誤、穩定與離開四個過程以及 Dwyer 等人的認識、變遷、維持和終止的過程等「關係發展」的理論概念，來探析國民黨基層黨工在建立社會關係中的發展過程、差異或變化以及他們的努力與方式。

從本文訪談資料中瞭解到國民黨黨工得以和黨員民眾建立關係的基礎，除了民眾服務站的職務身分提供了專職黨工關係建立的基礎之外，黨工自身的表現和風評與聲譽以及值得信任才是他們贏得黨員民眾相信的重要條件。有了信任和聲譽這兩個要素才能建構出黨工成功的「關係發展初期」第一階段，也才有 Larson 所說的後續「關係建立」第二階段時期的互信與互惠與合作關係可言，這種合作關係是黨工與民眾關係得以維持之重要關鍵因素。至於利害關係衝突，例如提名落空、選舉過程的對立等「權力」與「資源」的有無得失與交換，則是導致黨工他們與幹部關係變遷，甚至最後到「脫離」過程的理由，在黨工的訪談過程資料中得到相當的印證。所以，「聲譽」、「交情」、「信任」、「合作」、「互惠」、「權力」等因素在國民黨黨工關係的建立、維持與變遷的過程研究中確實有助於關係結構的解釋。

本文以國民黨苗栗縣所屬鄉鎮市民眾服務站的現、卸任黨工作為研究對象，從他們的訪談資料我們發現到：其一、國民黨在其遷台後的「改造」工作建立了民眾服務站的組織性質和其運作模式，使它可以透過服務民眾的方式來掌握社會的脈動並建立與支持其政權的社會基礎。其次、國民黨為了融入台灣社會，甄選了在地菁英做為其專職幹部，以他們在地人的優勢以及以「人情交往」及「關係取向」在地方社會中來建立其關係脈絡，透過他們贏得當地民眾的信任，來牽動社會連帶（social ties），建構了黨工的地方社會人脈關係，並在選舉或政治活動中發揮了他們所建立之連帶關係及影響力，並轉化成國民黨組織動員力量。

---

<sup>91</sup> 聯合報，民國 93 年 3 月 20 日，版 A11。

本文的遺憾是沒有透過量化的方法，分析國民黨黨工對於關係發展過程中許多變項之間的強弱、互相影響的互動關係，到底有那些外在因素影響了關係的變遷。此外，受限於作者的能力，在短時間內所蒐集的資料實屬有限，可說只是一個小小片段。在歷史發展、社會寬廣度等面向上仍有不足，對此不足的部分，有待日後之研究。作者也建議對此議題有興趣之後續研究者能將研究對象予以擴大至其他政治、社會菁英之訪問並加以分析比較，如此所得之研究成果與貢獻勢必更為輝煌。

## 附件一

## 訪談大綱：

## 一、背景資料：

- (一) 基本資料：請你簡單自我介紹，包含年齡、籍貫、學歷與經歷。
- (二) 進入管道：請說明初次與國民黨接觸的情形？怎樣成為國民黨的專職幹部？它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 (三) 民眾服務站與黨工的角色：請扼要說明國民黨地方黨部與民眾服務站的差別？它們如何運作？它的工作方式與效果為何？

## 二、關係網絡：

- (一) 關係如何建立：
  - 1、初任黨職或者職務調到新的環境，一開始你是如何與人建立關係？
  - 2、你是怎麼和他（他們）認識？這種關係對你的工作有何助益？
- (二) 關係的發展：
  - 1、你如何維持這種關係？
  - 2、你認為建立與黨員或民眾關係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 3、工作上是你的職務提供你關係的網絡？還是靠你自己建立了關係網絡？
- (三) 關係的衰退：
  - 1、影響關係衰退或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 2、你如何克服或改善這種式微的關係？
- (四) 關係的終止：什麼樣的情形之下，會讓你經營的關係終止？感想為何？
- (五) 今昔對話：
  - 1、請你比較或描述初擔任黨工和當前的工作環境與運作情形？
  - 2、工作上與地方派系的接觸為何？你怎麼看待地方派系？

## 附件二

## 訪問名單：

代號	年齡	受訪者經歷	訪問地點	訪問時間
L	70	三灣、南庄、通霄、銅鑼、頭份鎮黨部書記、縣黨部視導。	大湖鄉民眾服務社	93年3月29日 上午 1030
T	56	三灣、南庄、頭屋鄉黨部書記，縣黨部視導；苗栗縣政府勞工股長、自治課長、計畫室股長、文化中心秘書；現任南庄鄉戶政事務所主任。	南庄鄉戶政事務所	93年3月29日 下午 1430
R	87	南投縣埔里鎮、台中縣梧、太平、苗栗縣銅鑼、獅潭鄉黨部書記，苗栗縣黨部幹事退休。	苗栗市勵志街羅寓	93年3月30日 下午 1330
Y	50	卓蘭鎮、苑裡鎮、銅鑼鄉、苗栗市黨部主任。	頭屋鄉頭屋村張寓	93年4月5日 下午 1930

M	48	竹南鎮黨部婦女專員、視導。	竹南鎮民眾服務社	93年4月8日 下午 1730
K	43	南庄鄉黨部專員、三灣鄉黨部主任、縣黨部視導、苗栗縣第五區黨部書記，	頭份鎮民眾服務社	93年4月9日 下午 1730
H	70	西湖、大湖、獅潭、三灣鄉黨部主任，縣黨部視導、考紀會常委。	公館鄉五谷村黃寓	93年4月12日 上午 1030
W	64	泰安鄉黨部專員、視導	苗栗市高苗里伍寓	93年4月14日 下午 1530
C	76	竹南鎮黨部幹事、書記，縣黨部考紀會常委。	竹南鎮中美里陳寓	93年4月20日 下午 1530
J	50	通霄鎮、西湖鄉、苑裡鎮黨部主任。	苑裡鎮苑東里周寓	93年4月23日 下午 1830
P	56	三灣鄉黨部專員、苗栗縣黨部專員、視導、組長。	苗栗市福麗里吳寓	93年4月24日 下午 1430
G	31	竹南鎮、後龍鎮黨部專員	後龍鎮民眾服務社	93年4月24日 上午 0830
A	44	通霄鎮黨部專員，西湖鄉、後龍鎮、苑裡鎮黨部主任。	苑裡鎮民眾服務社	93年4月25日 上午 1000

焦點訪談：

- 一、時間：93年5月5日上午 1030。
- 二、地點：苗栗縣銅鑼鄉民眾服務社。
- 三、參加人員：

代號	年齡	經歷
S	51	泰安、公館、銅鑼鄉黨部主任；縣黨部專員、視導；苗栗縣第二區黨部書記
D	31	公館鄉、銅鑼鄉黨部專員
F	53	南庄鄉、卓蘭鎮、大湖鄉、三義鄉黨部主任
X	29	造橋鄉、公館鄉、三義鄉黨部專員
Z	49	獅潭鄉、苗栗市黨部婦女專員、西湖鄉黨部主任

## 參考資料

### 中文資料

- Andrew Heywood 著、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重譯，《最新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1 年（原書於 1997 年出版）。
- Chava Frankfort-Nachmias David Nachmias 著、潘明宏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下》（*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台北：韋伯，1999 年（原書於 1996 年出版）。
- Dick Morris 著、張志偉譯，《網路民主》（*Vote.com*），台北：喬周，2000 年。
- Earl Babbie 著、李美華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8<sup>th</sup>. Ed.*），台北：時英，1998 年。
- Floyd J. Fowler, Jr. & Thomas W. Mangione 著、黃朗文譯，《標準化的調查訪問》（*Standardized Survey Interviewing*），台北：弘智文化，1999 年。
- Floyd J. Fowler, Jr. 著、王昭正、朱瑞淵譯，《調查研究方法》（*Survey Research Method*），台北：弘智文化，1999 年。
- Frank Webster、馮建三譯，《資訊社會理論》（*Theories of Information Society*），台北：遠流（原書於 1995 年出版），2001 年。
- John Egan、方世榮譯，《關係行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台北：五南圖書（原書於 2001 年出版），2002 年。
- John Morrow、李培元譯，《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台北：韋伯文化（原書於 1998 年出版），2004 年。
- Mancur Olson、董安琪譯，《集體行動的邏輯》，台北：遠流，1991 年。
- Manuel Castells 著、夏鑄九、王志弘等譯，《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sup>nd</sup>.ed.*），台北：唐山（原書於 1996、2000 年出版），2000 年。
- Mark Buchanan 著、胡守仁譯，《連結—混沌、複雜之後，最具開創性的「小世界」理論》（*NEXUS: Small worlds and the Groundbreaking science of Networks*），台北：天下文化（原書於 2002 年出版），2003 年。
- Richard A. Krueger & Mary Anne Casey 著、洪志成、廖梅花合譯，《焦點團體訪談》（*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嘉義市：濤石文化，2003 年。
- Tom Richardson, Augusto Vidaurreta, with Tom Gorman 著、劉慧清、江郁清譯，《關係是一種策略性資產》（*Business is a contact sport*），台北：臉譜，2003 年。

- 王金壽，〈國民黨候選人買票機器的建立與運作：一九九三年風芒縣長選舉的個案研究〉，《台灣政治學刊》，2期，1997年，頁3-59。
- 王振寰，〈台灣式的民主：一些觀察〉，蕭新煌主編，《考驗台灣命運》，台北：允晨，1995年，頁295-297。
- 王振寰，《誰統治？如何分析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1996年。
- 王輝煌、黃懷德，〈經濟安全、家族、派系與國家：由制度論看地方派系的政治經濟基礎〉，徐永明、黃紀主編，《政治分析的層次》，台北：韋伯文化，2001年，頁117-181。
- 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著，〈關係取向：為中國社會心理方法論求答案〉，楊國樞、黃光國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台北：桂冠，1991年，頁49-66。
- 何來美，《劉黃演義—苗栗近代政治史話》，台北：台灣書店，1997。
- 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期，1992年，頁33-61。
- 吳乃德，〈地方勢力可能顛覆國民黨嗎〉，蕭新煌主編，《考驗台灣命運》，台北：允晨，1995年，頁109-113。
- 吳文程，《政黨與選舉概論》，台北：五南文化廣場，1996年。
- 吳重禮，〈亦敵亦友：論地方派系與國民黨候選人選擇過程的互動模式〉，《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學報》，第7期，1998年，頁177-204。
- 吳崑玉，〈網路政治：一個顛覆性的時代〉，《Catch選舉》，第5期，1996年，頁32-35。
- 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1995年。
-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
- 周育仁、鄭又平，《政治經濟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2年。
- 周素卿、陳東升，〈基層選舉下的地方政治與經濟利益：以房地產開發為例〉，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年，頁71-126。
- 居延安，《關係管理-企業的虛擬發展與人本再造》（*Relationship Management*），台北：楊智文化，2003年。
- 林佳龍，〈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卷1期，1989年，頁117-143。
- 林佳龍，〈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市場化—從威權鞏固到民主轉型〉，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年，頁160-260。

- 林智清，〈世界資訊網路將成選戰新利器〉，《Catch 選舉》，第 1 期，1995 年，頁 43-44。
- 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 著、曹衛東、王曉珪、劉北城、宋偉杰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2<sup>nd</sup>.ed.*)，台北：聯經，2002 年 (原書於 1962、1990 年出版)。
- 洪永泰、林瓊珠編著，《2001 年台灣政治紀實》，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編，台北：韋伯，2001 年。
- 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1996 年。
- 若林正文 (Masatake Wakabayashi)、洪金珠、許佩賢譯、吳密察審訂，《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2004 年 3 月二版一刷)。
- 徐火炎，〈選舉競爭與政治分歧結構的變遷：國民黨與民進黨勢力的消長〉，《人文及社學科學集刊》，6 卷 1 期，1993 年，頁 37-74。
- 徐火炎，〈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投票行為〉，《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學科學集刊》，7 卷 1 期，1995 年，頁 17-48。
- 徐火炎，〈選舉與台灣政黨重組的趨勢〉，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7 年，頁 245-262。
- 徐火炎，〈台灣的選舉與社會分歧－政黨競爭與民主化〉，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1998 年，頁 127-168。
- 高承恕、劉仁傑主編，《頭家娘：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台北：聯經，1999 年。
- 張昆山、黃政雄，《地方派系與台灣政治》，台北：聯經，1996 年。
- 張茂桂，〈探索台灣權力統治的三把入門鑰匙〉，《新新聞周報》，539 期，1997 年 7 月，頁 83-84。
- 張荳雲、譚康榮，〈形構產業網絡〉，張荳雲主編，《網絡台灣：企業的人情關係與經濟理性》，台北：遠流，1999 年，頁 16-61。
- 張維安、陳介玄，〈把生活結構放進來－三個台灣企業研究個案的分析〉，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編，《地方社會》，台北：聯經，1997 年，頁 159-210。
- 陳安，〈關於中國大陸民主化動力問題的比較研究〉，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1998 年，頁 459-488。
- 陳三井，《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台北：中央文物，1985 年。
- 陳介玄，《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聯經，1994 年。



- 陳介玄，〈派系網絡、樁腳網絡及俗民網絡—論台灣地方派系形成之社會意義〉，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編，《地方社會》，台北：聯經，1997年，頁 31-67。
- 陳怡如，〈政黨競爭與地方派系轉型之研究—台北縣中和市的個案分析〉，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03年。
- 陳明通、林繼文，〈台灣地方選舉的起源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年，頁 261-286。
-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1995年。
- 陳東升，《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台北：巨流，1995年。
-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合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澄社，1991年。
- 陳曉慧，〈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中對社會基礎的強化〉，《藝術學報》63期，1998年，頁 209-229。
- 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1992年。
- 彭懷恩，〈台灣地區政黨內部結構之分析〉，楊泰順編《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台北：民主基金會，1991年。
- 游盈隆，《民意與台灣政治變遷—1990年代台灣民意與選舉政治的解析》，台北：月旦，1996年。
- 游清鑫、鄭夙芬、陳陸輝合著，《面訪實務》，台北：五南，2001年。
- 費孝通，《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台北：風雲時代，1982年。
- 黃文齡，〈美國進步時期城市政黨組織與下層人民之互動關係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歐美研究》，21卷3期，1991年，頁 47-81。
- 黃光國，《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台北：巨流，1988年。
- 黃毅志，《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台北：巨流，1999年。
- 楊泰順，《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台北：民主基金會，1991年。
- 葉正綱，《中國消費市場行銷策略》，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2002年。
- 葛永光，〈選舉機器的理論建構—兼論國民黨的黨務改造方向〉，《理論與政策》，1996年，頁 136-147。
- 詹宏志，《趨勢報告/台灣未來的 50 個解釋》，台北：商周文化，1988年。
- 詹碧霞，《買票懺悔錄》，台北：商業週刊，1999年。
- 廖忠俊，《台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台北：允晨，1997年。
- 廖忠俊，《台灣地方派系及其主要領導人物》，台北：允晨，2000年。

- 趙永茂，〈基層政治菁英之個人背景分析〉，《思與言》，25（6）期，1988 年，頁 552-574。
- 趙永茂，《台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台北：翰蘆圖書，1997 年。
- 劉義周，〈國民黨責任區輔選活動之參與觀察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60 期，1992 年，頁 209-233。
- 蔡育全，〈「黨工」是三百六十行之外的一行〉，謝鴻儀主編，《一甲子年史—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民國 29 年至民國 89 年》，台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印行，2000 年，頁 132-133。
- 蔡明惠，《台灣鄉鎮派系與政治變遷-河口鎮「山頂」與「街仔」的爭鬥》，台北：洪葉文化，1998 年。
- 蔡詩萍，《誰怕政治》，台北：桂冠，1989 年。
- 鄭伯壘，《組織網絡的形成及其相關因素的探討》，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1996 年。
- 謝順欽，〈黨政關係六十年回顧〉，謝鴻儀主編，《一甲子年史—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民國 29 年至民國 89 年》，台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印行，2000 年，頁 92-98。
- 謝鴻儀主編，《一甲子年史—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民國 29 年至民國 89 年》，台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印行，2000 年。
- 簡大森，〈選舉走上資訊高速公路〉，《Catch 選舉》，第 1 期（內部刊物），1995 年，頁 42。
- 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雷飛龍譯，《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台北：韋伯文化，2000 年（原書於 1976 年出版）。
- 羅家德著、葉勇助整理，《企業關係管理》，台北：聯經，2003 年。
-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 1950-1969》，台北：稻鄉，1998 年。

#### 英文資料

- Berg, Bruce L.(1998),. "Ethnographic Field Strategies" , " Unobtrusive Measures in Research" ,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nt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Boston : Allyn and Bacon.
- Bosco, Jacobs.(1994), "Taiwan Factions : Guanxi, Patronage, and the State in Local Politics." *Enthnology*, Vol.31, No.2, pp.157-183.
- Burgess, Robert G. (1982) , "Approaches to Field Research." *In Field Research : a Sourcebook and Field Manual*. N.Y. : Routledge,pp.1-11.

- Dollinger, Marc. J. (1990), "The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strategies in fragmented indust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15. No.2 pp.,266-285.
- Hwang, K. K. (1987), "Face and Favor : the Chinese power game..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 (4) , pp.944-974.
- Larson, Andrea. (1992), "Network Dysds in entrepreneurial settings : A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of exchange relationship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7, pp.76-104.
- Thorelli, Hans B.1986. "Network : Betwee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7,pp.37-51.

#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Networks of KMT's Full-time Local Staff in Miao-li County

*Tao-Ming Chung* \* *Tong-Yi Huang* \*\*

## Abstract

In Taiwan's elections, relationship is a special feature often more important than policies. Politicians especially value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election district as well as their public services in order to build up their social network and to earn voters' support. In view of this, the KMT knows that they have to reinforce trust and relations among their supporters by providing good services through their full-time local staff.

The KMT established public service stations to develop its social connection with people in Taiwan in 1952. In various elections, the rank and file staffs can be easily mobilized and play a vital role to appeal to the people to support the KMT's candidates. However, researches on this subject are rare, resulting in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in political observation and elaboration with regard to public affairs.

This research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operation and procedures of KMT's Miao-li County public service stations but also analyzes how KMT's grass-root staff establishes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With the rapid changes of society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aiwan, the research on the changeover of the rol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KMT's local staff will also be addressed.

**Keywords:** the KMT, Public-Service-Stations, KMT's Full-time Local Staff, Relationship, Networks

---

\* Maste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in Feng Chia Univer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